

經濟制裁的得與失——政府與台灣可能受侵相關策略的評估與建議

Lessons Learned from Economic Sanctions: Implications for Government Policy and
Taiwan's Potential Invasion

Thesis

Presen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Master of Arts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By

Mac Bardayan

Graduate Program in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25

Thesis Committee: Jian Xiaobin, Mark Bender

Copyrighted by

Mac Bardayan

2025

Abstract

In the Cold War and the post-Cold War era world, economic sanctions have become a critical part of foreign policy. As economic sanctions are widely seen as a more peaceful route to handle conflict than military engagement, they have become a very popular method of handling a wide variety of global conflict at the expense of the global economy. However, despite their popularity especially in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I will argue in this thesis that economic sanctions have a limited use in coercing foreign states to change any political agenda, and that their usage in modern politics have become far too broad.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economic sanctions, while widely used as a tool of foreign policy, are often ineffective in achieving political goals, cause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humanitarian harm, and should be reserved for a narrow set of cases. The paper proceeds in four parts. First, it provides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sanctions, examining their evolution as a policy tool in the Cold War and post-Cold War eras. Second, it analyses several particularly chosen case studies representing diverse geopolitical contexts and highlights recurring patterns of sanction success and failure, particularly in achieving democratisation and deterring authoritarian behaviour. Third, it explores the broader implications of sanctions, including their humanitarian impact and economic costs. Finally, it offer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more strategic use of sanction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potential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摘要

在冷戰和後冷戰時代的世界，經濟制裁已成為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由於經濟制裁被普遍視為比軍事手段更溫和的衝突解決方式，因此它已成為全球以成本經濟為代價來處理各種全球衝突的主流方法。然而，儘管經濟制裁在美國等國家很普遍，但筆者將在本文中指出，經濟制裁在強迫外國改變任何政治議程方面的作用有限，而且它們在現代政治中，其使用範圍已過於泛濫。本文認為，經濟制裁雖然被廣泛用作外交政策工具，但往往無法有效實現政治目標，造成重大經濟和人道主義迫害，因此應僅用於少數情況。本文分為四個部分。首先，它提供了經濟制裁的歷史概述，研究了經濟制裁在冷戰和後冷戰時代作為政策工具的演變。其次，它分析了幾個特別選擇的代表不同地緣政治背景的案例研究，並強調了經濟制裁成功和失敗的案例，特別是在實現民主化和威懾獨裁行為方面。第三，它探討了經濟制裁的更廣泛影響，包括其人道主義影響和經濟成本。最後，它提供了更具策略性地使用經濟制裁的建議，特別關注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潛在衝突。

Dedication 論文奉獻

I dedicate this thesis to my family: Dan, Melissa, and Grant Bardayan

致謝

我想感謝俄亥俄州立大學漢語旗艦工程多年來給予的協助。我的論文導師，簡小濱老師，以及李敏儒老師、聶巧平老師、吳偉克老師、馬克•本德爾老師和給巨大的幫助但最後不巧人間蒸發的王建琦老師。旗艦工程對我的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過去這段時間我們一起經歷了風風雨雨，我非常感謝你們的辛勤工作和奉獻精神。

簡歷

2014-2018 年 Penn High School

2018-2019 年 江蘇省常州市高級中學

2019-2025 年 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和漢語 B.A.本科，漢語旗艦工程碩士）

目錄

Abstract 摘要	iii
Dedication 論文奉獻	iv
Acknowledgments 致謝	v
Vita 簡歷.....	vi
Contents 目錄.....	vii
Topic Background 主題背景.....	xii
Justification for Heavy Focus on US Sanctions 高度關注美國制裁的理由.....	xiii
第一部分：各類經濟制裁案例分析.....	1
1.1 古巴.....	1
1.1.1 過渡	4
1.2 伊朗.....	5
1.2.1 對伊朗的經濟制裁有效嗎？	7
1.3 中美貿易戰.....	9
1.3.1 中美貿易戰是否有效	11
1.4 北韓.....	12

1.4.1 對北韓的經濟制裁是否有效	13
1.4.2 各國應該如何應對北韓的未來行動?	14
1.5 俄羅斯.....	15
1.5.1 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是否有效	17
1.5.2 在當前情況下可以改變什麼來改變結果?	18
1.5.3 過渡	19
1.6 南非種族隔離.....	19
1.6.1 對南非的制裁是否有效	21
1.7 利比亞.....	22
1.7.1 對利比亞的制裁是否有效	24
1.8 第一部分結論.....	24
1.8.1 條件組 #1.....	25
1.8.2 條件組 #2	27
1.9 使用條件組對案例研究進行分析.....	29
1.9.1 古巴	29
1.9.2 伊朗	30

1.9.3 中美貿易戰	31
1.9.4 北韓	32
1.9.5 俄羅斯	34
1.9.6 南非	35
1.9.7 利比亞	36
第二部分：這些制裁的代價有多大？	38
2.1 制裁的人道主義影響	38
2.2 制裁的政治影響	40
2.3 制裁的經濟影響	41
2.3.1 對未參與國家的溢出效應	42
2.3.2 制裁的成本	42
2.4 對制裁的現實主義視角的論證以及進一步使用制裁的理想情景	44
2.5 外交與制裁	45
2.6 各個國家政治立場在制裁影響中的作用	46
2.7 集體制裁的力量	46
2.8 實現多邊制裁的障礙	47

2.9 制裁政策的戰略考慮因素.....	48
2.10 現實主義視角的論證.....	49
2.11 第二部分結論.....	50
第三部分：展望未來.....	52
3.1 干預的成本.....	52
3.2 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來遏制侵略性國家？	53
3.3 是否真的應該採取措施來遏制侵略性國家？	55
3.4 中國的局勢性質.....	56
3.5 基於中美貿易戰的經濟損失預測.....	57
3.6 如果大陸侵入台灣，對中國實施較輕制裁的影響.....	58
3.7 從俄羅斯制裁中吸取的教訓.....	59
3.8 使用條件組分析情況.....	59
3.9 潛在的應對措施.....	62
3.9.1 潛在的應對措施 1：制裁中國	63
3.9.2 潛在的應對措施 2：向台灣提供軍事援助，但不進行干預.....	64
3.9.3 潛在的應對措施 3：代表台灣進行軍事干預.....	64

3.9.4 潛在的應對措施 4：什麼都不做	65
3.10 第三部分結論	66
總結	68

主題背景

我們所知道的在現代政治中，經濟制裁是一種相對較新的工具。雖然經濟制裁可以追溯到 1800 年之前的雅典帝國，但其他國家之間基本上只有自由貿易，幾乎沒有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經濟制裁首次廣泛運用。在冷戰時期，由於核武擴散威脅出現，它們因此變得更加受重視

然而戰爭代價太大，人類生命的價值日益受到重視，全球化使國際衝突達到空前激烈程度，經濟制裁已成為處理衝突的重要段。現在，各國特別是那些經濟強勁國家，透過停止貿易或對各國徵收關稅來對付衝突，從而利用這些經濟體。然而，問題在於，若目標導向強度不足，它難以促成政治變革，而且大多時候，它只會增加國家的利益，同時給弱勢國家帶來經濟困難。

高度關注美國經濟制裁的理由

不同國家使用經濟制裁的方法有很大差異。美國以其對國家、個人和公司廣泛使用經濟制裁而聞名。截至 2025 年 2 月，美國的制裁清單涵蓋有 27,121 個實體，遠超其他國家 (United States Sanctions Index, n.d.)。基本上對於任何衝突，美國都很快實施制裁，因為人們普遍認為，經濟制裁是處理衝突的有效手段，能促進目標國家的變化，而且總體上是一種相對無害的處理衝突的手段。不幸的是，這一手段是否具有高的有效性始終令人擔心。

中國等國家的制裁使用頻率明顯低於美國。從本質上講，雖然中國使用經濟制裁，但其基本上在所有情況下都是會有報復。截至本文撰寫時，中國對其他國家實施的大多數經濟制裁都是為了回應其他國家對其實施的經濟制裁。

由於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更廣泛地使用制裁，本文重點探討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的制裁行為，並在較小程度上將歐盟和聯合國也作為傾向於使用制裁國家/組織。

第一部分：各類經濟制裁案例分析

本文這一部分的目的是提供使用經濟制裁的各種不同案例的背景。筆者會分析每個案例的具體細節，並審視這些案例的成功和失敗之處。

古巴

使用「經濟戰」的最早和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是美國對古巴的禁運。古巴由於鄰近美國、實行共產主義革命、與蘇聯關係密切、對美國經濟的依賴，使其成為美國試探經濟戰的完美目標。1958 年，美國開始對古巴實施禁運，首先限制武器銷售。到 1962 年，禁運範圍擴大，美國對古巴的出口幾乎完全禁止，只有農產品等少數例外 (McGrath North, 2007)。這標誌著全球持續最久的禁運之一的開始，而該政策的目標和成效至今仍存爭議。

必須在冷戰緊張局勢的背景下理解禁運。「紅色恐慌」是 1950 年代末期美國反共情緒高漲的時期。在約瑟夫·麥卡錫的領導下，對蘇聯影響力的擔憂主導了當時的公共輿論和美國的外交政策議程。美國政府透過宣傳將共產主義描繪為生存威脅，並廣泛調查潛在的共產主義支持者，進一步激化了這種恐慌。在此背景下，由菲德爾·卡斯楚領導的古巴共產主義革命被視為直接威脅，特別是考慮到古巴距離佛羅里達州僅 150 公里的地理位置。紅色恐慌與古巴的地理接近相結合，奠定了禁運背後的理由。

最初，美國試圖用軍事手段對付古巴。1961 年，美國發動秘密「豬灣行動」，試圖推翻卡斯楚政府。然而，這次行動徹底失敗，不僅引發了古巴的民族主義情緒，還迫使美國將經濟制裁作為對付古巴的主要工具。

據估計，古巴禁運每年對美國和古巴分別造成 12 億美元和 7.53 億美元的潛在收入損失 (Pepper, 2009)。此外，聯合國持續通過決議譴責美國的古巴禁運，但只有美國和以色列支持這一政策。儘管國際社會不斷向美國施壓要求解除禁運，但美國政府對禁運的支持幾乎從未動搖。面對這些壓力和巨大的負面影響，問題變成了：這次禁運的目的究竟是什麼？這些目標是否實現了？

禁運的既定目標有三：遏制共產主義的蔓延、防止拉丁美洲的「骨牌效應」以及使古巴民主化。然而，禁運始終未能實現這些目標。考慮到美國的意識形態和經濟實力，將共產主義的傳播視為對美國直接威脅的觀點並不可信。同樣，「骨牌效應」的說法缺乏有力證據支持。

「骨牌效應」是麥卡錫的理論，即如果一個地區的一個國家「陷入」共產主義，鄰國將不可避免地效仿。隨著古巴「陷入」共產主義，麥卡錫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如果美國不採取行動，整個拉丁美洲也可能步其後塵。古巴與蘇聯的結盟及其對左翼政府和叛亂分子的積極支持加劇了這些擔憂，並進一步鞏固了這樣一種觀念，即為了美國的利益，對古巴採取行動實為必要。

然而，禁運本身並未削弱古巴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力。儘管受到美國制裁的經濟限制，古巴仍與多位左翼領導人保持牢固的意識形態聯繫。此外，禁運並未建立一個相互合作的體系，而是迫使拉丁美洲國家選邊站隊，導致古巴、委內瑞拉和尼加拉瓜等國成為地區局外人，形成了兩極化的環境。然而，即便如此，左翼運動在這種環境中仍然持續，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蓬勃發展。禁運旨在孤立古巴，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這一目標得以實現。任何有關禁運阻止共產主義進一步「傳播」的說法仍然只是推測。

最終，古巴民主化的目標——可以說是禁運最重要的目標——毫無疑問地失敗了。如果經濟制裁是民主化的有效工具，那麼這一成果早應實現。儘管禁運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古巴始終抵制美國的要求。這種彈性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替代效應」，使得古巴得以減輕禁運的影響。

「替代效應」是指一個國家能夠用國內商品和服務，或另一個未實施經濟制裁的國家的商品和服務，來取代來自經濟制裁國的商品和服務。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替代效應可能導致商品的性價比不如在沒有經濟制裁下的情況。然而，在許多情境中，這種下降幅度相對有限，特別是在涉及非特殊商品時。這種現象解釋了為什麼經濟制裁的成功通常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國家聯盟來支持，並促進制裁的整體效果。如果一個國家僅承受邊際經濟損失，並能通過替代效應以稍微減慢的速度實現經濟增長，那麼它自然缺乏動力去滿足制裁國的要求。這樣的結果導致持續的不必要損失，這些損失不僅無法對受制裁國造成實質影響，還會導致效果下降，造成國內生產總值 (GDP) 低於潛在水準。

儘管古巴因禁運面臨更高的成本，但古巴經濟在禁運期間的表現仍然相對穩定，主要原因是替代效應的發揮。由於蘇聯對古巴的出口提供補貼，並將古巴視為首選貿易夥伴，古巴一度是拉丁美洲最具經濟實力的國家之一。由於蘇聯經濟長期位居世界第二，這些補貼和優先貿易地位為古巴帶來了顯著利益。1988 年，古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了今天被認為是拉丁美洲經濟強國的國家，例如墨西哥、智利和巴拿馬 (World Bank Open Data, 2023)。然而，古巴的經濟在此期間並未充分實現多元化，該國約 84% 的國際貿易仍依賴蘇聯 (Bain, 2005)。

即便面臨美國的巨大壓力，古巴仍能在其既定經濟體系下生存並取得一定繁榮。儘管其經濟成就可能不及沒有禁運時的潛力，但古巴的經濟和人民生活依然有所改善，甚至在禁運期間收入也有所增長。

古巴真正的考驗出現在蘇聯解體之後。蘇聯的解體對嚴重依賴蘇聯的古巴經濟造成了重大打擊。在 1989 年至 1993 年間，古巴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 急劇下降了 17.2%，因為古巴努力尋找新的貿易夥伴 (Macrotrends.net, 2023)。這段時期凸顯了經濟孤立的挑戰以及在缺乏主要盟友時替代效應的局限性。

然而，儘管面臨這些困境，共產主義在古巴依然存在。儘管古巴本可以改變其政治結構並重新點燃與美國的關係，但古巴政府始終拒絕屈服於美國的要求。如今，除美國和以色列外，大多數國家都與古巴保持貿易關係，而古巴已成為一個蓬勃發展的旅遊目的地，其經濟整體呈上升趨勢。

自 1962 年以來，美國對古巴實施了史上最全面的經濟制裁之一。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政策給兩國造成了數千億美元的損失，但未能實現其預期的政治目標。相反，這項禁運成為了單邊經濟制裁在實現系統性變革方面局限性的有力例證。

如果沒有多邊支持或現實的目標，針對根深蒂固政權的經濟制裁往往無法成功，特別是對那些能夠找到替代貿易夥伴的國家。未來的經濟制裁政策應借鏡古巴的經驗，優先考慮多邊合作、明確目標以及減少意外後果（例如加強獨裁統治）的策略。

過渡

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經濟制裁都是平等的。在古巴這樣的情況下，有人試圖透過經濟制裁徹底改變政治制度，政府將拒絕讓步，並會承受經濟制裁的影響並拒

絕改變。然而，當經濟制裁與戰爭和戰爭戰略相關時，經濟制裁實際上往往是一個真正有意義的強大工具。在改變一個國家的軍事能力或抑制軍事行動方面，有許多有效利用經濟制裁的例子。

伊朗

美國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可以追溯到 1979 年伊朗革命，這標誌著兩國關係緊張的開始。由於美國在國王統治期間與伊朗關係密切，革命支持者將其視為帝國主義、壓迫和伊朗政治問題的象徵。1979 年，由於對國王政府的不滿和廣泛抗議，國王逃離伊朗 (Taheri, 2004)。革命領袖阿亞圖拉霍梅尼重新獲得了公眾的廣泛支持，並建立了伊斯蘭共和國。

儘管美國在國王統治末期戰略性地與其保持距離，但在革命支持者眼中，美國仍被認為是國王的帝國主義「傀儡師」。革命後，美國與阿亞圖拉新政府的關係如履薄冰。即使美國公開聲明支持伊朗新政府，並表達希望「與伊朗團結一致反對共產主義」的願望，但伊朗公眾對美國的態度依然極為負面。

國王在流亡期間患上淋巴瘤，並尋求治療。儘管他人在墨西哥，但他拒絕在墨西哥或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就醫。雖然擔心允許他進入美國可能加劇與伊朗的緊張局勢，但吉米·卡特總統仍不顧美國國務院的建議，允許他在紐約接受治療。此舉引發了紐約和德黑蘭的抗議，最終導致美國大使館遭襲，並爆發了伊朗人質危機。作為回應，美國凍結了伊朗數十億美元的資產，並實施全面經濟制裁。雖然危機在 444 天後以《阿爾及爾協議》結束，但經濟制裁仍在持續，為數十年的經濟限制奠定了基礎。人質危機導致伊朗受到國際譴責，貿易和外交活動陷入困境。儘管伊朗承受了巨大代價，但由於對美國的不信任及扣押美國人質的政治意圖，他們堅持了超過一年。這場

危機最終以 1981 年《阿爾及爾協議》結束，根據協議，美國同意解凍伊朗資產、不干涉伊朗內政，並通過國際仲裁解決法律爭端 (Algiers Accords, 1988)。作為交換，伊朗釋放了人質並清償了欠美國機構的債務。

儘管人質危機結束後，伊朗資產被解凍，但經濟制裁並未全面解除。相反，人質被釋放後，雷根總統對伊朗實施了武器禁運，作為美國支持伊拉克參與兩伊戰爭的一部分。這一措施進一步加劇了美伊緊張關係，也鞏固了美國作為伊朗主要對手的角色。1987 年，伊朗宣布支持真主黨和哈馬斯等反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後，美國加大了對伊朗的制裁力度，再次實施全面經濟限制 (Levs, 2012)。從 1987 年至 2015 年，伊朗在國際舞台上舉步維艱，多數國家為避免美國的報復選擇與伊朗保持距離。與古巴不同，古巴能從共產主義集團內部獲得大力支持，而伊朗的非左翼政策使其無法與共產主義國家建立緊密聯盟，儘管雙方同樣反對美國。俄羅斯和中國雖最終與伊朗開展貿易，但這些合作始終有限且猶豫不決，例如華為高管孟晚舟因涉嫌違反美國對伊朗制裁而被拘留的事件。

2015 年，聯合全面行動計畫 (JCPOA) 的簽署使伊朗的制裁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根據這項由聯合國安理會、德國和伊朗共同起草的計畫，伊朗同意放棄其所有核能力（核能生產除外），接受國際機構的合規監督，作為交換，伊朗的各類經濟制裁將被取消。在 JCPOA 通過後，美國仍對伊朗實施了一些經濟制裁，特別是針對其涉嫌侵犯人權的行為。然而，與核子和石油相關的制裁被全面解除，這使得伊朗幾十年來首次能夠在國際市場上自由出售石油，其他國家也無需擔心因購買伊朗石油而遭受美國制裁。JCPOA 為伊朗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提振。在此期間，伊朗嚴格遵守協議規定的鈾濃縮限制，並展現出願意用核活動限制換取更多國際貿易自由的意願。

儘管 JCPOA 被視為外交突破，但也遭到來自美國及其中東盟友的嚴厲批評。批評者認為，該協議的「日落條款」規定的時間限制僅延緩了伊朗的核計畫，而無法完全防止其發展核武。此外，人們擔憂該協議僅關注核問題，未涉及伊朗的彈道飛彈計畫或其對恐怖組織的支持等其他爭議話題。唐納德·川普將這些缺陷作為其 2018 年退出 JCPOA 的理由，並聲稱協議存在「核心缺陷」。然而，經濟制裁的取消和隨後恢復不僅破壞了協議，還促使伊朗恢復核濃縮活動，使 JCPOA 原本試圖解決的問題進一步惡化 (Landler, 2018)。隨著美國退出 JCPOA 並重新實施經濟制裁，伊朗經濟迅速受到重創。雖然伊朗加大了石油生產投資，但他們再次無法輕易向多數國家出售石油。恢復制裁也進一步損害了美伊關係，伊朗如今再次突破 JCPOA 商定的範圍，重新推進核計畫和鈾濃縮 (Reuters Staff, 2019)。

對伊朗的經濟制裁有效嗎？

針對伊朗的經濟制裁效果參差不齊。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美國因侵犯人權和支持哈馬斯與真主黨等恐怖組織等政治原因對伊朗實施制裁，但自這些組織成立以來，伊朗在這兩方面始終沒有讓步，即使面臨更嚴厲的經濟制裁。他們的行為表明，對伊朗而言，政治上最重要的是維護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教法，並實現以色列「從地圖上消失」的目標，即使這意味著需要承受嚴厲的經濟制裁。

伊朗與古巴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兩國在面臨數十年的巨大經濟壓力下，依然維持了各自的政治體制。同樣，伊朗也通過經濟替代和國際夥伴關係，尤其是與非西方國家的合作，來減輕制裁的影響。在這兩種情況下，制裁未能使獨裁政權實現民主化或被削弱，反而助長了民族主義情緒，強化了伊朗抵禦外部壓力的能力。伊朗再次成為面對制裁卻不改變其政治行為和立場的另一個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像伊朗這樣的案例也展示了如何實際且策略性地使用經濟制裁。例如，通過簽署《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CPOA) 並遵守其規定，伊朗表明了他們為減輕制裁負擔而願意做出改變的態度。《聯合全面行動計畫》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伊朗並未被要求改變價值觀或信仰，亦未被要求撤回對任何組織或國家的支持。簽署該協議並不違背伊朗的核心原則。此外，由於伊朗此前從未擁有或尋求擁有核武器，簽署協議對伊朗而言尤為容易。通過簽署協議，他們基本上只是同意接受監控，以避免做他們本來不打算做的事情。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隨著美國在 2018 年重新實施制裁，反而給了伊朗發展核武能力的動力。雖然沒有實質證據表明伊朗現在已擁有核武器，但 2021 年，前中央情報局局長詹姆斯·伍爾西在《國家評論》中寫道，伊朗「可能已經擁有原子彈」。由於美國不再堅持《聯合全面行動計畫》的目標，伊朗可能出於報復心理，選擇進行美國所不希望的行動。此外，儘管伊朗在協議簽署之前並無發展核武的計劃，但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擁有核武對伊朗而言是一個非常明智的選擇。自 1979 年以來，與伊朗關係融洽的國家寥寥無幾，擁有核武作為威懾手段可以增強伊朗的全球地位。儘管伊朗軍事力量在全球排名中名列前茅，但如果西方支持對伊朗的軍事攻擊，該國可能會面臨崩潰。然而，若伊朗擁有核武器，潛在的衝突更可能演變為一場冷戰，雙方因懼怕彼此的能力而不敢輕易發動攻擊。

伊朗的案例凸顯了如何有效地利用經濟制裁，以及偏離制裁條件可能適得其反的風險。正如《聯合全面行動計畫》所示，目標明確的定向制裁可以在不威脅國家核心價值的情況下實現有意義的結果。然而，旨在重塑國家意識形態或政治制度的廣泛制裁則效果較差，並且往往適得其反。伊朗的經驗強調，設計經濟制裁政策時需要精確、多邊合作和外交策略。缺乏針對性的制裁只會加劇不必要的敵意，減少國際合作

和貿易，從而損害制裁實施國和目標國，而類似《聯合全面行動計畫》中提到的多邊、有針對性的制裁則更可能帶來正面結果。

中美貿易戰

經濟制裁被用於政治目的但失敗的最新且最顯著的例子之一是中美貿易戰。雖然貿易戰不如古巴和伊朗面臨的全面禁運那麼全面，但它有相似的目標，也是高估經濟制裁創造政治變革能力的另一個例子。

中美貿易戰的起因主要是美國前總統和現任總統川普的責任。川普以民族主義為綱領，尋求「攻擊」他認為對美國構成經濟威脅的國家，實施多項經濟保護主義政策，對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各國加徵關稅，對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產生了重大影響。他最臭名昭著的行為之一無疑是挑起中美貿易戰。

川普在其整個公共生活中不斷將經歷經濟強勁增長和繁榮時期的亞洲國家視為對美國霸權統治的威脅。當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他指責日本剝削美國市場並「嘲笑」美國。隨著日本經濟危機後放緩，進入長期經濟停滯期，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十年間 GDP 從 2001 年的 1399.4 億美元成長到 2011 年的 7551.5 億美元，成長 463.8% (World Bank Open Data, 2023)。川普將長期以來對日本的批評轉向中國，指責日本操縱匯率並利用美國推動其經濟成長；經常使用他之前對日本使用完全相同的話術。

川普首次當選後，發動貿易戰的政治和經濟環境已經成熟。美國當時正經歷強勁的趨勢逆轉。由於強烈的經濟聯繫和合作，中國曾經被視為較為中立的中國，現在卻被廣泛視為美國兩黨的敵人。2018 年 3 月，川普非正式地開始了對中國的貿易戰，他在推特上表示：「…貿易戰是好的，而且很容易獲勝」，隨後對太陽能電池板和洗衣機徵收關稅。這雖然不是直接針對中國，而且實際上對其他國家產生了更大的影

響，但仍然最常見地被視為貿易戰的開始。這些關稅遭到了所有受影響國家的強烈反對和困惑，中國迅速做出反應，對美國徵收了價值 30 億美元的關稅，影響到新鮮和乾果、堅果、葡萄酒、鋼管、豬肉、豬肉產品和再生鋁。繼第一輪關稅和中國對關稅的回應之後，川普發起了第二輪，這次直接針對中國。2018 年 3 月 22 日，美國對中國徵收了一份高度全面的關稅清單，且僅針對中國，針對飛機零件、電池、平板電視、醫療設備、衛星和各種武器等商品 (Swanson, 2018)。雖然第一輪關稅針對的是中國向美國出口超過進口的產業，但尚不完全清楚這些關稅是對中國的攻擊還是只是對美國產業的保護主義行為。但第二輪顯然不同，除了對中國經濟的攻擊之外，不能被理解為任何其他東西。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些關稅根本不受歡迎。中國最初對美國加徵關稅進行報復，是為了向美國發出停止加徵關稅的訊息，並且中國和美國一樣有能力加徵關稅。然而，川普並沒有像中國希望的那樣結束關稅，而是加倍提高關稅，加劇了緊張局勢。自 2001 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一直倡導自由貿易，減少貿易壁壘，並向外國投資開放市場。貿易戰打亂了這一軌跡，威脅到中國的經濟成長。然而，中國領導人被迫進行報復。從政治上講，如果不做出回應，將意味著在全球舞台上的軟弱和丟臉，從而損害中國作為崛起大國的地位。結果，兩國陷入了針鋒相對的戰鬥，各自徵收關稅，擾亂了目標產業的貿易。

2020 年 1 月 15 日，雙方同意取消 58% 的關稅，並在一定程度上恢復貿易正常化。到 2022 年，儘管局勢緊張，但 42% 的關稅仍然存在，中國持續流行和封鎖，美國和中國市場都出現 2008 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中美貿易將遭受重創 (Miller, 2023)。儘管政治局勢緊張，美國和中國在經濟上仍然存在著極其強烈的相互依存關係。

中美貿易戰是否有效

缺乏具體、實際的目標一直是貿易戰的明顯缺陷。這場衝突不是針對具體的改革，而是對中國政治和經濟體系的更廣泛的攻擊。美國本質上對中國有著長期的不滿清單，包括其威權治理、涉嫌侵犯人權、領土主張、網路安全威脅等。即使中國解決了美國的一些擔憂，但這些不滿的廣泛性使得美國不太可能永遠都會感到完全滿足。這種動態確保了無論領導層或政策如何變化，貿易戰都將持續下去。

貿易戰也因其在美國國內兩黨的支持而引人注目。雖然川普發起了這場衝突，但他的曾經的繼任者、現在的前任喬·拜登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這項政策，反映出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罕見的共識領域。這種政治共識使得貿易戰不太可能很快結束，因為雙方都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並支持利用關稅來對抗其影響力。

中美貿易戰最終將演變成古巴式的局面。雖然由於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中國不太可能像古巴那樣面臨美國的全面禁運，因為這將帶來巨大的經濟成本，但關稅和報復措施的持續存在表明存在長期衝突。緊張局勢加劇時期可能會導致關稅增加，而緊張局勢緩和時期可能會出現像 2020 年 1 月那樣的微小讓步。在可預見的未來。

迄今為止，中美貿易戰是一場無效且代價高昂的努力。雖然它給兩國帶來了經濟負擔，但它未能實現任何目標。由於缺乏具體目標，加上美國和中國經濟的緊密聯繫，使得貿易戰更像是一場象徵性的制裁，而不是戰略衝突。

中美貿易戰就是一個強而有力的例子，顯示當經濟制裁具有政治針對性且只有單方面支持時，經濟制裁就會失敗。中國適應經濟壓力的能力確保了關稅沒有導致有意義的讓步。相反，衝突加劇了敵對行動，給雙方造成了持續的經濟損害，並導致了

很可能成為長期僵局，而且看不到明確的解決方案。此外，由於這些經濟制裁是單方面的，即使關稅加大，對中國政府來說，在幾乎所有主要產業中，替代始終是一個簡單的選擇。儘管美國確實對世界經濟的許多部門擁有重大控制權，但中國確實有許多其他貿易夥伴可以在必要時取代美國。

最終，中美貿易戰凸顯了經濟制裁作為脅迫強國的工具在更廣泛的範圍內的無效性。如果沒有多邊支持或明確的目標，經濟制裁不可能帶來系統性政治變革。相反，它們往往為所有相關方帶來巨大成本，而且更多的是加劇緊張局勢而不是解決緊張局勢。此案例強調需要採取更具策略性和合作性的方法來管理國際衝突。

北韓

北韓可能是經濟制裁應用最廣泛的著名案例之一。北韓的成立是二戰後日本撤出朝鮮半島，美國與蘇聯分裂半島的結果。儘管美國與蘇聯在二戰期間是盟友，但意識形態的分歧導致了緊張局勢的加劇，這些緊張局勢在朝鮮半島尤為明顯。隨後北韓與南韓爆發戰爭，最終在 1953 年實現了有效停火。

在所有國家中，北韓可能是地球上最孤立的國家之一。由於缺乏朋友與貿易夥伴，北韓始終無法建立起強大的經濟體系。雖然北韓與中國和俄羅斯之間有一些基本的經濟合作，但雙方的關係一直緊張。

目前，大多數國家對北韓實施了某種形式的經濟制裁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7)。聯合國安理會已通過多項決議譴責北韓的核飛彈試射，就連北韓最親密的「盟友」也投票支持對其試驗實施經濟制裁。

由於普遍不受歡迎，北韓自建國以來經濟發展有限。相比之下，其資本主義鄰國南韓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並見證了歷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增長之一，

而北韓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與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相當。從太空中俯瞰朝鮮半島，南韓與中國的邊界清晰可見，而北韓則呈現一片黑暗。

不可否認，經濟制裁對北韓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顯著的阻礙作用。由於貿易稀少，北韓只能依靠自身資源生存。然而，儘管其經濟發展微乎其微，並且幾乎在所有方面與外界隔絕，但北韓仍持續發展核武庫，並招募強大的軍事力量，這使得其他國家為避免與其發生任何形式的軍事衝突付出了高昂代價。

總體而言，對北韓的經濟制裁原本旨在迫使其放棄核武庫，換取更大的經濟合作機會與經濟發展能力，但實際上經濟制裁在施壓方面幾乎完全無效。相反，北韓每年持續投入大量資源建設軍事和核武庫，並不斷進行具有威脅性的核試驗，成為全球高度關注的問題。

對北韓的經濟制裁是否有效

對北韓的經濟制裁既有有效的，也有無效的。經濟制裁成功地阻止了北韓的經濟發展，並限制了其軍事參與能力。但同時，由於北韓以軍事為核心，軍事對於國家運作至關重要，因此經濟制裁對改善北韓局勢幾乎完全無效。

因此，北韓是一個強有力的例子，說明即使實施嚴厲經濟制裁，在不涉及軍事干預的情況下，那些意識形態強烈且不重視經濟發展的國家也不會受到經濟制裁的壓迫。由於北韓能夠利用其自然資源發展軍事，對北韓的經濟制裁並未改變其核武野心。

各國應該如何應對北韓的未來行動？

不與北韓這樣的國家進行業務往來，不會對其他國家的經濟造成太大影響。如果北韓經濟開放，北韓及其夥伴國家可能會實現適度的經濟成長，但其他國家的潛在成長可能相當有限。儘管持續對北韓實施經濟制裁無法有效阻止北韓發展軍事設施，但經濟強大的北韓可能帶來更多經濟上的挑戰。軍事強國通常擁有最大的經濟體，並且最有能力承擔維持軍隊的高成本。

儘管經歷了數十年的經濟制裁和經濟孤立，北韓不僅保留了其獨裁政權，還繼續推進其核武計畫。這表明經濟制裁在這樣一個高度孤立的國家實現重大政治或政策變化方面具有局限性。

雖然經濟制裁未能解除北韓的核武計畫或帶來重大的政策變化，但替代策略值得考慮。六方會談或 2018 年至 2019 年期間的峰會等外交接觸展示了對話在緩和緊張局勢方面的潛力。儘管這些努力未能達成持久協議，但這種溝通有助於減少即時風險並遏制北韓的野心。

將選擇性經濟制裁與持續外交接觸相結合的雙軌策略可能會提供更務實的前進道路。通過提供激勵措施，例如分階段解除經濟制裁以換取無核化的具體步驟（類似於伊朗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框架），國際社會可能在單靠經濟制裁失敗的地方取得漸進的進展。此外，加強與地區利益相關方（特別是中國、韓國和日本）的合作，可能有助於緩解北韓的安全擔憂，而這些擔憂是其高成本核計畫的主要原因。

總之，對北韓的經濟制裁表明，利用經濟壓力試圖影響意識形態政權本身是徒勞無功的。如果經濟制裁的唯一目的是推動北韓政權更迭，那麼顯然無法實現。然

而，在此情況下，經濟制裁的成功之處在於減緩了北韓軍事實力的增長，並削弱了北韓的合法性。

在現代世界，不做重大妥協的情況下取消對北韓經濟制裁的風險遠遠超過可能帶來的任何好處。以與《聯合全面行動計劃》類似的方式，維持對北韓的定向經濟制裁，即使這些制裁無法有效阻止北韓侵犯人權和擴充核武庫，仍可能是最務實的前進之路。

俄羅斯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引發了現代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一些經濟制裁，針對的是一個處於戰爭中的全球主要大國。與大多數以美國為首的經濟制裁案例不同，此次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幾乎涉及每個西方國家、日本、台灣，甚至包括中立的瑞士，影響深遠。這些制裁嚴重限制了俄羅斯進入全球市場的機會，使其極度依賴日益減少的貿易夥伴。儘管採取了這些前所未有的措施，俄羅斯的韌性也暴露出經濟制裁在實現最終政治目標方面的局限性。

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始於 2014 年吞併克里米亞之後。這些初步措施針對與吞併相關的個人和實體，限制俄羅斯銀行，並停止關鍵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例如俄羅斯和德國之間的北溪 2 號管道。雖然這些制裁對寡頭和俄羅斯精英帶來不便，但對更廣泛的俄羅斯公民及其經濟或國家地緣政治野心的影響微乎其微。

從 2014 年到 2022 年期間，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時有起伏。儘管西方普遍不支持俄羅斯的行動，但雙方之間仍然有明確的合作意願。貿易基本上維持正常，俄羅斯能夠輕鬆參與全球經濟。

這一切在 2022 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發生了改變。各國政府嚴厲警告普京，如果俄羅斯攻擊烏克蘭，將面臨嚴厲的經濟制裁。普京無疑知道入侵會對俄羅斯經濟造成影響，例如盧布崩潰以及主要外國企業撤出。然而，即使收到這些明確的警告，他仍於 2022 年 2 月 24 日發動了一場「特別軍事行動」，聲稱目的是保護居住在頓巴斯地區的俄羅斯族人 (Hodge et. al, 2022)。隨著烏克蘭在西方財政和軍事支持下成功防禦，俄羅斯原本迅速接管的期望落空了。這場曠日持久的衝突為經濟制裁提供了新的背景，制裁的目標從威懾轉變為經濟懲罰和遏制。

將俄羅斯排除在全球金融資訊網路 SWIFT 之外，是對其經濟採取的最重要措施之一。SWIFT 是一個全球交易網絡，負責絕大多數的跨境貿易。簡而言之，世界上大多數銀行都透過 SWIFT 連接在一起，俄羅斯（除極少數例外）無法使用該網絡，導致任何形式的跨境貿易變得更加困難。如果某個國家希望與俄羅斯交易，他們將不得不使用替代方法。雖然替代方案確實存在，但遠不如 SWIFT 普及，這使得與俄羅斯的所有交易更加困難，而且即使不直接對俄羅斯實施制裁，也很少有國家或個體公司願意與之交易。

此時，俄羅斯經濟比以往更加孤立。俄羅斯與歐盟的貿易總量下降了約 50%，對歐盟的天然氣出口減少了 90% (Lee, 2022)。

目前，俄羅斯的貿易主要轉向與哈薩克、白俄羅斯等前蘇聯國家，以及土耳其和中國進行。由於俄羅斯與歐洲的貿易規模大幅縮小，它在烏克蘭戰爭期間對中國的依賴顯著加深。在目睹俄羅斯未能迅速吞併烏克蘭後，中國對衝突採取了中立立場，並從中獲利 (Ni, 2022)。

由於中俄之間的貿易幾乎不受制裁影響，中國能夠以折扣價增加從俄羅斯的進口。由於經濟制裁，中國得以以優惠價格購買俄羅斯能源，而歐洲卻面臨歷史上最高的能源價格。

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是否有效

遺憾的是，雖然武器禁運作為援助烏克蘭戰爭的一項措施效果顯著，經濟制裁也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俄羅斯經濟的發展，但整體而言，目前的經濟制裁僅對俄羅斯產生了有限的影響。其原因在於俄羅斯成功地利用替代方案來緩解制裁的壓力。儘管這些替代方案削弱了經濟效益，例如削減了市場中的自然競爭力，供應商被迫接受更低的商品價格，而消費者則需要支付更高或接受質量較低的商品。然而，這些影響僅導致經濟的輕微下滑，而非全面衰退。這正是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俄羅斯經濟所呈現的情況。

儘管俄羅斯經濟有所下滑，但並未對其戰爭行動產生實質性限制。克里姆林宮將軍事開支置於經濟穩定之上，使戰爭得以持續，即便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此外，俄羅斯國內的韌性和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減弱了制裁的影響。政府的宣傳和對公共敘事的嚴密控制成功地將經濟制裁塑造成對國家主權的攻擊，進一步強化了公眾對政府的支持。

多邊經濟制裁的效果因中國等重要國家的參與有限而受到抑制。儘管此次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規模空前，但中國在能源及其他領域持續與俄羅斯進行貿易，為俄羅斯提供了經濟命脈，緩解了部分西方制裁的壓力。與土耳其及白俄羅斯等國的類似經濟合作也幫助俄羅斯適應制裁，進一步削弱了制裁的影響。全球未能全面參與，導致難以經濟上孤立俄羅斯。

總體來看，雖然經濟制裁增加了成本並擾亂了貿易，但未能有效削弱俄羅斯的軍事力量或改變其政治戰略，凸顯了經濟制裁作為單一工具的局限性，尤其是針對資源豐富且意識形態驅動的國家時。

在當前情況下可以改變什麼來改變結果？

俄羅斯是一個極難被有效制裁的國家。若俄羅斯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小國，則其經濟可能會更容易被制裁癱瘓。然而，作為世界上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俄羅斯擁有豐富的資源和人力，使其比利比亞等國更難以被壓制。此外，俄羅斯還善於利用替代貿易途徑來緩解制裁影響。

若想通過經濟制裁達成實際效果，制裁國需要設法限制俄羅斯依賴替代貿易的能力。一個可能的策略是對繼續與俄羅斯進行貿易的國家實施二級經濟制裁。例如，迫使中國在進入西方市場和與俄羅斯保持貿易關係之間做出選擇，可能會極大限制俄羅斯的經濟活動。然而，這類措施需要前所未有的國際協調，可能會擾亂全球貿易網絡，並加劇制裁對全球經濟的不利影響。此外，由於俄羅斯顯然將戰爭視為國家的最高優先事項，僅靠經濟壓力很難促使其改變行為，尤其是在目前制裁力度有限的情況下。

單靠經濟制裁可能無法決定性地結束衝突，但與其他措施結合使用，可能成為有效的輔助手段。如果西方國家決心遏制俄羅斯的侵略並維持烏克蘭的獨立，願意延長衝突並承擔更大的經濟代價，那麼可以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加強經濟壓力和廣泛的制裁，同時增加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向烏克蘭提供先進武器裝備、經濟和後勤支

援，將有助於在對抗俄羅斯侵略的過程中創造更有利的條件，但這也可能增加戰爭的死亡人數並損害全球經濟。¹

過渡

本文的案例研究——古巴、伊朗、北韓和俄羅斯——顯示，單邊制裁由於無法在全球範圍內推廣，往往難以奏效。制裁的成功取決於多邊合作、明確且可實現的目標以及對目標國核心價值的尊重。從俄羅斯經濟制裁中汲取的教訓，對未來的潛在衝突 (如中國可能對台灣的侵略) 有直接影響。與俄羅斯類似，中國的經濟韌性及其戰略夥伴關係將使經濟制裁的有效性更加複雜，並引發是否應實施制裁的困難抉擇。如果無法滿足本文後續討論的條件，經濟制裁將可能鞏固獨裁政權，造成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同時對制裁國和目標國的經濟造成重大損害。

南非種族隔離

肯定地說永遠沒有經濟制裁的餘地是不公平的。有人認為，經濟制裁有效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可能就是南非的例子。從 1948 年到 20 世紀 90 年代初，南非由一個名為國家黨的白人 (Afrikaner) 政治團體統治。在國家黨的領導下，實行了制度化的種族隔離和歧視制度。在種族隔離制度下，一系列法律和政策導致生活各個層面的種族隔離。存在一個種族等級制度，白人位於頂端，印度裔次之，有色人種再次之，黑人則位於最底層。為每個種族群體劃分了特定區域，排除了「低等種族群體」，以確保特

¹ 請參見第 51 頁，以了解更多詳情。

定社區僅有白人居民。儘管種族隔離名義上遵循「隔離但平等」的政策，但現實卻與此相悖。種族身份決定了教育、醫療和就業機會的質量。

雖然在 1948 年這些政策最初實施時，南非並未引起太多關注，因為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仍在實行種族隔離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全球逐漸擺脫殖民主義的種族思維，南非成為少數仍保留種族隔離政策的國家之一。

1962 年 11 月 6 日，聯合國通過第 1761 號決議，譴責種族隔離制度，成立了聯合國反對種族隔離特別委員會，並對南非實施經濟制裁據特設政治委員會報告書通過之決議案（（一七六一），1962）。1963 年，經濟制裁進一步擴大到武器禁運（一八三（一九六三），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決議案，1963）。

最初，對南非的這些經濟制裁缺乏統一意見。西方國家希望避免針對國家黨並引發緊張局勢。在聯合國決議通過時，美國仍實施種族隔離法，針對南非實施類似政策可能顯得虛偽。此外，國家黨的主要反對派，由納爾遜·曼德拉領導的非洲民族議會（非國大），被美國列為共產主義恐怖組織。當時正值冷戰，美國寧願看到一個種族主義政權，而非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尼克松總統任期內推出了「焦油寶貝」政策，美國對南非的態度是將種族隔離視為一個不情願接受的現實。即使聯合國對南非實施經濟制裁，美國仍繼續在南非投資。

到了 1984 年，局勢發生了變化。南非這一年通過了新憲法，賦予印度裔和有色人種參與政治事務的部分權利，但繼續排斥黑人。這引發了騷亂，導致西方主要國家對國家黨失去了耐心。1984 年 6 月和 7 月，包括美國在內的主要西方國家對南非實施了嚴厲的經濟制裁 (Knight, 2001)。隨後，許多外國公司撤離南非，對南非的投資被視為高風險。資本大量外流，南非蘭特出現嚴重通脹。

1990 年，南非釋放了納爾遜·曼德拉，並將非國大合法化。1994 年，納爾遜·曼德拉當選總統，種族隔離制度被廢除。納爾遜·曼德拉本人將經濟制裁視為促使國家黨作出改變的重要催化劑，但經濟制裁的效果仍存在爭議。

在一篇題為「對南非的經濟制裁：它們產生了什麼效果？(Sanctions on South Africa: What Did They Do?)」的論文中，Philip Levy 認為，對南非的經濟制裁只是次要因素，對結束種族隔離影響有限。他認為，種族隔離的終結是一個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純粹的經濟角度看，經濟制裁並非對南非經濟最具破壞性的事件。南非經濟中有 35% 依賴外債，1985 年當大通銀行停止向南非提供貸款時，其他主要外國貸款機構也紛紛效仿，隨之而來的是流動性危機。相比 1984 年的制裁，這導致了更大的經濟衰退。

此外，Levy 認為，西方國家的貿易制裁大多可以被規避。儘管這需要一些昂貴的進口替代，但最終只影響了南非 GDP 的 0.5%，不足以造成嚴重經濟困境。

在南非的案例中，經濟制裁通常被視為結束種族隔離制度的關鍵因素之一。然而，因為制裁與其他無數因素共同作用，其實際影響難以量化。國際層面上，聯合國等組織的譴責和壓力可能在國家黨失去合法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國內，非國大等抵抗運動在納爾遜·曼德拉等領袖的帶領下，透過抗議、罷工和公民不服從，推動了大規模的反種族隔離動員。這些運動的核心訴求是反對種族不平等，而非單純基於經濟問題。

對南非的制裁是否有效

對於曾繁榮的南非白人社區來說，經濟問題比未曾繁榮的黑人社區更具影響力。儘管經濟困境可能使一些注重商業利益的南非白人轉向支持非國大運動，但缺乏

進一步證據證明經濟制裁在種族隔離瓦解中的重大作用。在包括經濟制裁在內的國際壓力、其他外交因素及國內局勢的共同影響下，種族隔離制度的垮台是一個多因數的過程。經濟因素雖然對政權瓦解有一定影響，但只是推動南非走向民主與種族平等的更大力量之一。

因此可以得出結論，雖然經濟制裁並非種族隔離終結的決定性因素，但它仍可能是一個促成因素。雖然經濟制裁的具體影響難以量化，但考慮到制裁的針對性和國際支持，可以說制裁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成功推動了南非的政治變革。儘管經濟制裁在南非的效果仍具爭議，但在面對類似情況時，各國政府不應因此放棄實施經濟制裁。相比於繼續種族隔離政策的長期代價，避免制裁帶來的經濟損失顯得微不足道。種族隔離政策的持續存在風險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利比亞

經濟制裁在特定條件下如何發揮作用的典型例子就是利比亞。與其他情況下的經濟制裁往往因過於雄心勃勃的政治目標、解決方案模糊或缺乏多邊支持而失敗不同，對利比亞的經濟制裁具有明確目標、高度多邊化的特點，並為利比亞提供了減輕制裁負擔的明確途徑。

1979 年至 2011 年間，利比亞由穆阿邁爾·卡扎菲 (Muammar Gaddafi) 領導。他以其古怪性格和極端決策而聞名。在卡扎菲眼中，利比亞是西方國家的敵人，而他對西方的仇恨則源於童年時期義大利對利比亞的殖民統治。

1988 年 12 月 21 日，泛美航空 103 號班機在蘇格蘭洛克比鎮上空被一枚炸彈摧毀，機上所有人以及洛克比的幾名居民因掉落的碎片而喪生。聯邦調查局與蘇格蘭鄧弗里斯和加洛韋警察局聯手調查了此案，歷時三年後對兩名與爆炸案有關的利比亞國

民，拉明·哈利法·費希馬和阿卜杜勒巴塞特·梅格拉希 (Abdel Basset Ali al-Megrahi and Lamen Khalifa Fhimah)，發出逮捕令 (Pan Am 103 Bombing, n.d.)。當局要求利比亞引渡嫌犯接受審判，但卡扎菲因對西方的不滿以及其支持反西方恐怖分子的歷史，拒絕引渡並表示只在利比亞境內審判。

1989 年 9 月 19 日，UTA 航空一架航班從布拉柴維爾起飛，經停恩賈梅納後繼續飛往巴黎，途中以類似泛美航空爆炸的方式墜毀，機上所有人喪生。聯合國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CAO) 調查發現，布拉柴維爾機場的炸彈由剛果恐怖分子攜帶，其供述牽連到卡扎菲的姐夫阿卜杜拉·塞努西在內的六名利比亞人。ICAO 要求利比亞將嫌犯引渡至巴黎接受審判，但卡扎菲再次拒絕 (Finlay, 2022)。

由於卡扎菲的拒絕，聯合國於 1992 年通過第 748 號和第 731 號決議，實施經濟制裁以譴責利比亞政府的行為，使其商業航空活動受限（關於阿拉伯利比亞民衆國的項目(第七三一號決議)(S/24846)，1992），（第七四八號決議，1992）。利比亞回應挑釁，拒不合作，導致聯合國隔年通過第 883 號決議，進一步強化制裁，包括限制利比亞出口其主要收入來源——石油。隨著 883 號決議的頒布，利比亞貿易舉步維艱，逐漸被國際社會孤立（第八八三號決議，1993）。

經過多年經濟制裁，卡扎菲最終妥協，開始遵守國際要求。由於制裁導致經濟困境和國際壓力，利比亞於 1998 年努力重返國際社會。1999 年，利比亞同意將與泛美航班爆炸案相關的嫌犯引渡至荷蘭受審。荷蘭作為一個中立國，既保全了卡扎菲的面子，又滿足了蘇格蘭的司法需求。2003 年，在多年拒絕承擔責任並拒絕合作後，利比亞正式承認對洛克比空襲和 UTA 爆炸負責，並支付經濟賠償：洛克比空難受害者獲得 27 億美元（每位約 1000 萬美元），UTA 受害者獲得 1.7 億美元（每位約 100 萬美元）(Slevin, 2003)。這些賠償與解除制裁直接掛鉤，對利比亞的策略至關重要。

2003 年早些時候，聯合國安理會正式解除對利比亞的經濟制裁，結束了長達十多年的限制。儘管美國初期保留了一些制裁，但在利比亞宣布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後，美國逐步解除制裁。最終，美國的努力甚至超越了聯合國制裁的初衷（安全理事會第 1506 號決議，2003）。

對利比亞的制裁是否有效

利比亞的案例完美地展示了經濟制裁的作用。這些制裁具有多邊性、明確的目標，針對單一經濟結構的關鍵部門，並且在策略上具有一定的靈活性（例如，選擇荷蘭而非蘇格蘭作為審判地點），有效遏制了較弱國家的軍事威脅，同時避免影響其他國家。雖然花費十多年時間才實現預期目標，但持續的制裁給利比亞經濟帶來了巨大壓力。如果未來再現類似情況，以類似方式實施制裁應該仍然是有效且值得推行的策略。

第一部分結論

雖然不可能涵蓋所有制裁案例，但重要的是需注意，且大多數具有政治動機的制裁並未能脅迫目標國家。即使國家可能沒有被脅迫，但也有一些案例，舉例：北韓，由於制裁導致經濟疲軟，使其成為一種切實可行的外交政策工具。

然而，在多數情況下，制裁已被用於處理衝突，即使這會給發起制裁的國家帶來重大損失，並且未能對目標國家的整體局勢產生任何有意義的影響。這對全球經濟來說是一個非常具有破壞性的趨勢，並且是全球經濟發展放緩的主要原因。為了確保全球繁榮，重要的是從上述情況中吸取教訓，並將制裁的使用限制在少數情況下。在筆者看來，必須滿足以下條件之一才能證明使用制裁的合理性：

條件組 #1

1. 制裁將會抑制一個經濟疲軟但具有威脅性的國家發展軍事力量。此條件取決於一個國家對其競爭對手未來潛在軍事力量的個人解讀。
2. 徵收制裁將會有效地削弱目標國家的經濟。這可以適用於一個國家在經濟上高度依賴於目標國家或目標國家集團的情況。如果替代品可以有效地取代大多數以前的經濟活動，則不符合此條件。
3. 制裁將會有效地實現基於安全或經濟的目標。當國家之間存在顯著的實力不平衡並且存在高度的經濟依賴性時，國家自然會希望避免制裁。因此，對於一個經濟強國來說，將制裁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具有戰略意義。如果一個國家不遵守經濟和/或安全要求，則威脅實施制裁可以成為強國在不使用武力的情況下獲得其想要條件的有效手段。然而，由於制裁對雙方都是具有破壞性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威脅實施制裁的國家始終最好設定合理且可實現的條件。威脅實施制裁的國家應將互利與合作放在首位，只有在目標方不遵守條件時，他們才需要擔心制裁的威脅。這類談判的理想結果應該是避免實際實施制裁，而僅將其作為不遵守規定的威脅手段。²

雖然我們可以將上述條件作為適用制裁的基本原則，但考慮制裁實際成功的情況也十分重要。關於這一主題最具影響力的論文之一是羅伯特·佩普 (Robert Pape)

² 佩普特別將這種「經濟策略」與經濟制裁區分開來，根據他的定義，「經濟制裁」純粹是政治性的。然而，這一定義並非普遍接受，且受到其他學者的批評。因此，在本文中，筆者將把對未能遵守經濟/安全目標的行為施加懲罰的這種經濟策略定義為經濟制裁的一種形式。

1997 年的論文「為什麼制裁不起作用 (Why Sanctions Do Not Work)」。在本文中，他使用了一份其他人先前使用的制裁的綜合清單作為證據，論證在略少於一半的案例中，制裁將會產生預期的結果。他強烈批評確定制裁成功構成要件的方法，並通過排除任何涉及軍事脅迫、實際上沒有達到制裁目標、實際上不是經濟制裁以及沒有明確方法確定制裁是否是導致預期結果的原因的案例，他認為在他最初研究使用的 115 個案例中，只有 5 個案例可以被視為「成功」。這五個案例是：

1. 對羅德西亞的制裁（1977 年）：許多國家對羅德西亞實施制裁，以迫使白人少數派政府結束其種族隔離政策，並朝著多數人統治的方向發展。制裁成功地促進了羅德西亞政府的垮台和新的多數人統治政府的建立。
2. 對南非的制裁（1986 年）：除了羅德西亞之外，經濟制裁也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對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起作用。佩普認為，經濟制裁是結束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關鍵因素。制裁使該國經濟陷入癱瘓，並導致國際社會廣泛譴責該國政府的政策。
3. 對海地的制裁（1991 年）：在軍事政變推翻讓-貝特朗·阿里斯蒂德民選政府後，國際社會對海地實施了制裁。佩普認為，制裁確實對孤立軍事政權和為阿里斯蒂德重返政權創造條件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4. 對塞爾維亞的制裁（1992-1995 年）：國際社會對塞爾維亞實施經濟制裁，以迫使該國政府結束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的衝突。制裁與軍事干預相結合，最終導致了《代頓協定》的簽署，從而結束了前南斯拉夫的衝突。

5. 對利比亞的制裁（1992 年）：國際社會對利比亞實施制裁，以迫使該國政府交出洛克比空難的嫌疑人。雖然無法完全確定制裁在該案中的作用程度，但佩普確實承認制裁是一個關鍵因素，當與其他外交方式努力相結合時，最終迫使利比亞引渡嫌疑人並解決爭端。

即使這些案例並不完美，並且關於這些案例是否可以算作制裁的成功仍然存在重大爭議，但由於它們被最著名的經濟制裁批評者之一視為成功，因此它們為導致經濟制裁可能「成功」的必要條件提供了良好的基礎。經濟制裁成功的定義尚未達成廣泛共識，因此筆者認為對定義採取保守的方法最符合本論文的立場。由於經濟制裁的成本可能非常高，因此除非有明顯的好處，否則政府應避免使用它們。

佩普列為成功的案例具有一些共同的條件：

條件組 #2

1. 多邊主義：所有成功的案例都涉及廣泛的多邊制裁方法。制裁是由多國聯盟實施的，而不是單一國家單方面採取行動。由於存在廣泛的國際共識，因此目標國家更難逃避制裁或找到替代夥伴。由於這種多邊主義是持續的，因此制裁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雖然單獨行動是可能的，尤其是在有明顯霸權國家實施制裁的情況下，但無論情況如何，多邊主義始終是理想的。
2. 明確的目標：成功的制裁具有明確且可實現的目標，這些目標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例如，在南非的案例中，目標是結束種族隔離政權，這被視為嚴重侵犯人權。沒有明確的目標，就會出現像對古巴的禁運那樣沒有盡頭的情況。

3. 經濟槓桿：在所有成功的案例中，目標國家都嚴重依賴國際貿易或資金流動。

這使國際社會對目標國家具有顯著的經濟槓桿作用，使其更容易帶來變革。在經濟強國，自給自足的可能性更大，更容易抵制制裁。

4. 靈活性：成功的制裁是靈活的，如果目標國家滿足特定條件，則可以解除制裁。這使目標國家有動力遵守國際社會的要求，並提供了一條擺脫制裁制度的途徑。

5. 尊重：制裁應嚴格避免威脅國家的身份、民族自豪感或任何類型的核心信仰。應該有具體的事情可以讓一個國家做以解除這些制裁。這主要應用於脅迫國家改變其軍事結構。

在考慮經濟制裁時，政府應考慮國際和目標國的政治和經濟環境是否符合這些條件，以及制裁是否旨在實現明確、靈活的目標。如果目標模糊不清，例如「防止侵犯人權」而沒有確定哪些具體行為構成侵犯人權，那麼制裁將不可避免地無法實現目標。此外，如果一個國家經濟實力雄厚，那麼用經濟制裁來脅迫它也將非常困難。在佩普的所有「成功」案例中，被脅迫的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或欠發達國家。因此，除非有非常特殊的原因，否則最好不要期望通過制裁來脅迫經濟強國會取得成功。

這些條件只包括少數案例，因此，對於目前正在實施制裁的國家來說，從經濟角度來看，除了特殊情況外，應採取措施逐步結束這種做法。

使用條件組對案例研究進行分析

以下是用本文中列出的每個案例研究使用本文第 24 頁和第 27 頁上的條件組 #1 和條件組 #2 進行的分析。請參考本節中的上述列表。

古巴

條件組 #1

在古巴的案例中，事實上，對古巴的禁運可能對古巴發展成為對美國更強大的軍事威脅產生了影響。然而，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在古巴的案例中，存在很大程度的替代，而且古巴的經濟在該地區並非處於最佳狀態，技術獲取也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根據條件組 #1，如果美國認為古巴是潛在的軍事威脅，那麼美國有足夠的理由制裁古巴。鑑於古巴導彈危機的背景、兩國之間的激烈競爭以及美國與古巴的地理位置鄰近，制裁古巴對美國來說是甚為合理。

條件組 #2

條件組 #2 解釋了為什麼對古巴的制裁總體上可能是失敗的。它們沒有針對性，不是多邊的，也沒有任何明確的目標。此外，對古巴的制裁還針對政府形式和國家的核心理想。對古巴的禁運仍在繼續，古巴除了民主化之外，沒有辦法擺脫制裁。古巴已經成功地對大多數事物進行了替代，並且仍然保持著比許多鄰國更高的人均 GDP。目前為止，只有美國和以色列支持繼續對古巴實施禁運，這使得遏制古巴的努力難以實現。

結論

根據條件組 #1 規定的條件，美國有合理的理由制裁古巴。然而，由於美國必須基本上單獨行動，並且除了民主化之外，對古巴沒有明確的目標，而民主化是不太可能發生的，因此繼續對古巴實施禁運，因為它對創造任何變革的影響很小，可能沒有多大意義。美國繼續對古巴實施禁運是否有意義，最終取決於美國對古巴的軍事威脅的感知。美國通過維持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而古巴與美國相比，人口和資源總體上都缺乏，這使得古巴即使能夠通過解除禁運來擴張其軍隊，也將拒絕對美國及其盟國採取任何軍事行動，因為成功的機會非常有限。在筆者看來，如果美國仍然將古巴視為軍事威脅，那麼對兩國來說最好的解決方案是美國維持對古巴的武器禁運，但在其他所有方面解除禁運。雖然這不可避免地可能仍然會促進古巴的一些軍事建設，但假設美國保持其軍事力量，對美國的威脅總體上非常小。

伊朗

條件組 #1 和 #2

在對伊朗實施制裁的案例中，根據目前的情況，條件組 #1 和條件組 #2 都沒有得到滿足。由於對伊朗實施的制裁鼓勵了核建設，沒有任何明確的目標，而且伊朗仍然設法進行貿易，以至於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而制裁仍然存在，因此目前實施的制裁是不合理的。《聯合全面行動計畫》是良好制裁談判的完美典範。該協議是多邊的，有明確的目標，沒有攻擊伊朗的理想，並且只要滿足基本條件，就是一個比較靈活協議。伊朗作為一個高度依賴石油的經濟體，其持續的經濟成功依賴於對外貿易。因此，這表明伊朗，如果按照條件組 #1 的第三個條件給予合理的條件，願意

做出妥協以避免制裁。然而，美國目前對伊朗的制裁制度卻恰恰相反。制裁似乎只是為了削弱伊朗經濟而仍然存在，沒有任何最終目標，除了徹底的政治顛覆。

結論

伊朗的案例向我們展示了制裁如何被戰略性地和非戰略性地使用。通過威脅實施制裁以應對缺乏合作，制裁可以有效地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然而，當制裁被用作譴責政治政權的手段，並且國家沒有辦法減輕制裁時，就像目前對伊朗的制裁一樣，目標國家將不願意合作，結果將是雙方經濟損害加劇緊張局勢。因此，伊朗證明制裁在實現政治目標方面往往是無效的，國家不應在沒有滿足規定的條件組的情況下實施制裁。

中美貿易戰

條件組 #1

雖然乍看，美國似乎通過發動貿易戰而擁有戰略或經濟目標，川普聲稱這是為了「保護美國的就業機會」。然而，進一步的審視，這實際上只是毫無根據的政治言論，貿易實際上造成了雙邊經濟損失，當然也沒有對美國的就業率做出積極貢獻。如果貿易戰不再像以前那樣有利可圖，那麼將業務基地設在中國的美國公司更有可能將基地遷往越南或孟加拉國等國家。如果中國自然而是這些公司生產的最佳市場，那麼通過發動貿易戰，這些公司將被迫在成本更高、質量更低或兩者兼而有之的劣等地區生產。這些成本隨後轉嫁給消費者，最終結果對美國和中國來說都是不理想的。

中美貿易戰的唯一目的似乎是投射出美國「對中國強硬」的形象，同時損害兩國經濟。因此，條件組 #1 沒有得到滿足。

條件組 #2

中美貿易戰不是多邊的，缺乏明確的目標，缺乏靈活性，而且基本上是作為對中國治理體制的攻擊而發起的。雖然有人認為存在一定的經濟槓桿作用，但兩國經濟高度相互交織，都表現出對彼此相對較高的依賴程度。因此，條件組 #2 沒有得到滿足。

結論

中美貿易戰顯然與兩個條件組都相反。因此，中美貿易戰本身幾乎沒有機會實現任何潛在目標，只要它持續下去，就會繼續造成潛在經濟增長的損失。

北韓

條件組 #1

由於制裁，北韓在軍事和經濟發展方面面臨困難。由於北韓無法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進行貿易，因此北韓遠遠落後於其鄰國。雖然北韓的軍事力量就其規模和經濟實力而言無疑是強大的，但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原題投入的 GDP 百分比才能使這成為可能。按 GDP 百分比計算的軍事支出，北韓在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烏克蘭 (Wonju, 2020 年)。因此，雖然北韓無疑是一個堅定的國家，並且願意承擔軍事發展的巨額成

本，但這並沒有改變制裁嚴重阻礙了其發展並阻止其成為更大威脅的事實。因此，根據條件組 #1，對北韓的制裁是合理的。

條件組 #2

條件組 #2 突出了北韓制裁面臨的問題，並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制裁沒有取得更大的成功。雖然全球對北韓有經濟影響力，而且制裁得到了全球範圍內的高度支持，但就目前而言，北韓仍然能夠與多個國家進行貿易。截至 2022 年，北韓的進口總額為 9.03 億美元，出口總額為 1.92 億美元，其中大部分貿易是與中國進行("Military Spending as a Share of GDP in North Korea," 2024)。由於中國是一個如此龐大的經濟體，而且在貿易方面對世界非常開放，因此與北韓保持如此密切的貿易關係極大地幫助了北韓的生存。雖然近年來中國和北韓的貿易關係有所減弱，但不能忽視的是，這種關係仍然是維持北韓能夠繼續運作的主要因素。

此外，雖然川普確實試圖改善美朝關係，但仍然不能忽視的是，這些制裁是美國對北韓政治政權不滿的結果。因此，雙方只有敵意，缺乏相互尊重。雖然北韓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並且考慮到北韓的治理方式，沒有理由期望這樣做，但總體而言，這確實損害了制裁的有效性。

結論

就目前而言，除了徹底的政權更迭之外，北韓幾乎沒有什麼可以做來解除制裁。北韓領導人顯然不願意這樣做，並且會盡其所能地保住權力。對北韓的制裁有效地阻止了該國增加其軍事威脅，但遺憾的是，對創造任何形式的政治變革幾乎沒有作用。由於北韓仍然能夠通過中國進行貿易，因此北韓仍然能夠在建立核武庫的同時維

持經濟。在北韓的案例中，制裁並不是真正旨在帶來變革，而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其潛在威脅。因此，使用條件組，我們可以將對北韓的制裁評估為有缺陷的，但總體而言，這仍然是強國阻止流氓國家發展的成功案例。

俄羅斯

條件組 #1

在俄羅斯的案例中，條件組 #1 沒有得到滿足。俄羅斯已經擁有世界第二強大的軍隊，因此通過使用制裁來阻止軍事發展是不可能的。俄羅斯經濟雖然肯定受到了制裁的影響，但正在適應制裁，而且總體而言，由於制裁不是多邊的，因此仍然能夠通過替代維持其大部分以前的貿易。此外，由於俄羅斯在入侵之前已經考慮了制裁的成本，並且仍然選擇入侵，因此制裁不能真正用於實現任何類型的軍事或經濟合作目標。

條件組 #2

條件組 #2 也沒有得到滿足。俄羅斯作為一個非常龐大和強大的國家，不像一個較小的國家那樣依賴國際貿易。此外，許多大型經濟體，如中國，繼續與俄羅斯進行貿易，因此即使俄羅斯被排除在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之外，他們仍然可以相對容易地進入國際市場。雖然制裁導致許多國際品牌撤出該國，但在許多情況下國內仿製品在許多情況下已經完全取代了它們。

雖然如果俄羅斯選擇與烏克蘭談判和平協議，可能會有一定的靈活性，並且西方希望看到一個和平獨立的烏克蘭，目標也比較明確，但制裁本身並不足以讓俄羅斯將其視為戰爭中的一個高度重要的因素。

結論

看看條件組，很明顯為什麼對俄羅斯的制裁在遏制烏克蘭戰爭方面收效甚微。俄羅斯的國家規模太大，自給自足，無法真正通過制裁來削弱。制裁缺乏多邊主義只會進一步削弱這一點，因此，就目前情況而言，制裁不是應對俄羅斯侵略的實用方法。

南非

條件組 #1

在南非的案例中，由於涉及太多其他因素，因此無法說明條件組 #1 是否得到滿足。由於對南非實施的制裁是多邊的，並且可能導致大規模撤資，因為公司發現投資風險太大，因此在種族隔離結束前的時期，南非經濟一片混亂。由於無法說明制裁是否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因此條件群組 #1 可能得到滿足，也可能沒有滿足。

條件組 #2

在南非的案例中，條件組 #2 得到完美滿足。制裁國高度多邊主義、目標明確、具有經濟影響力、靈活且尊重。對南非實施制裁的方式可以作為未來類似案例的典範。

結論

南非案例的主要問題是了解制裁在實現最終結果方面發揮的作用。雖然最終結果是理想的，並且實施制裁的方式也是理想的，但了解制裁本身產生的影響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南非的案例仍應被視為制裁的成功案例。

結論

使用條件組對上述案例進行的評估表明，它們可以作為一個良好的框架，用於評估實施制裁的最佳時機，以及在實施制裁時，制裁國應如何行事以實現最佳最終結果。如果各國繼續在不遵循條件組規定的準則的情況下實施制裁，那麼全球經濟損失將繼續不必要地加劇。

利比亞

條件組 #1

在利比亞的情況下，條件組 #1 顯然已經滿足。在卡扎菲統治下，利比亞的經濟高度單一化，嚴重依賴石油，並且製造了重大的國際安全問題。

條件組 #2

條件組 #2 也已滿足，因為制裁是多邊的，目標明確，由於利比亞高度依賴外部經濟，制裁對其產業造成了嚴重影響。此外，制裁具有靈活性，並且從未公然冒犯利比亞的核心理念。

結論

利比亞基本上是經濟制裁應如何實施的完美案例。所實施的制裁符合條件組的要求，而該國的政治與經濟狀況使得制裁既有必要，又易於執行且能夠有效發揮作用。

第二部分：這些制裁的代價有多大？

量化制裁的總成本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制裁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影響。在本節中，筆者將評估制裁對國家產生的各種影響類別，並提供筆者的分析。

制裁的人道主義影響

不可否認，制裁會帶來巨大的、往往未被討論的人道主義影響。雖然經濟制裁通常被認為是一種「仁慈的」站戰爭形式，因為沒有實際的軍事戰鬥，但例如對古巴的禁運表明，經濟制裁並不是一種非常「人道主義的」處理衝突的方式。以醫療保健和營養為例。根據「經濟危機和美國禁運對古巴健康的影響」(Garfield, 1997) 這篇廣泛引用的關於古巴禁運的各種非經濟影響的論文，「在 20 世紀 80 年代，古巴進口了大約一半供人類消費的蛋白質和卡路里。從 1989 年到 1993 年，食品的進口量下降了約 50%，從 1989 年到 1992 年，人均蛋白質和卡路里供應量分別下降了 25% 和 18%。低成本配給分配的卡路里只有大約 1200 卡路里。精製糖占有卡路里的比例很高，這加劇了卡路里的短缺，從 1989 年的 18% 增加到 1992 年的 26%。營養狀況持續下降，直到 1994 年底開放了不受限制的農產品市場。據估計，這個私營部門為人口提供了大約 10% 的卡路里補充 (John Guy, Instituto de Nutricion, 1995)。兒童、婦女和老年人已成為通過配給、公共衛生教育、工作場所和學校供餐計劃以及促進城市園藝來保護免受營養不足的目標。因此，定點監測數據顯示，卡路里、蛋白質和微量營養素缺乏的負擔主要落在成年男性身上，他們的卡路里攝入量從 1989 年的 3100 卡路里下降到 1994 年的 1863 卡路里。體重低於 2500 克的新生兒比例上升了 23%，從

1989 年的 7.3% 上升到 1993 年的 9.0%，逆轉了 10 年的逐步進展。該國每年約 15 萬例新生兒幾乎都是在醫療機構出生的。儘管低出生體重的其他風險因素有所下降，包括吸煙、高生育率和 20 歲以下婦女的生育率，但出生體重仍然下降。據推測，如果沒有優先配給和補充食品計劃，低出生體重率的上升幅度會更大。但是，儘管婦產中心的補充餵養計劃的入學人數從 1989 年到 1992 年增加了兩倍，但仍然缺乏食物，體重增加仍然很差。此外，提供此類補充劑的能力一直在下降。以前，所有 13 歲以下的兒童和所有 65 歲以上的兒童都能獲得有保證的每日牛奶配給。然而，自 1992 年以來，這些配給只提供給 7 歲以下的兒童。現在，通過讓婦女在附近的工作人員食堂吃飯、從附近的國營農場預留牛奶和雞蛋，以及從旅遊業工人那裡獲得美元捐款，正在採購更多的食物。」除了文章中引用的所有這些營養不良的影響外，由於禁運嚴重限制了醫院的可用資金，古巴還面臨著醫療保健質量下降的問題。因此，由於美國的禁運，古巴的預期壽命降低，生活質量大幅下降。

同樣值得討論的是，使用制裁來阻止經濟發展是否存在人道主義問題。通過使用制裁，制裁國直接導致經濟活動減少，以服務於政治或軍事議程。該國人民淪為受害者。通過使用制裁來減緩經濟發展會導致經濟機會減少、可用工作崗位減少以及流入目標國和制裁國的潛在收入減少。隨着時間的推移，貧困率將會上升，人們將會變得不那麼富裕，在像北韓這樣的極端情況下，國家將無法看到任何真正的經濟發展，極端貧困將成為常態。雖然在某些極端情況下，阻止經濟發展可能是合理的，但由於有明顯的受害者，他們除了居住在受制裁影響的地方之外什麼也沒做，因此這是一個在道德上值得懷疑的問題。

雖然經濟制裁可能不像軍事戰爭那樣具有明顯的人道主義影響，但重要的是，各國政府不要忽視制裁造成的往往是悲劇性的人道主義影響。經濟制裁直接導致預期

壽命降低、生活水平下降和收入不平等加劇。因此，必須避免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使用制裁。

制裁的政治影響

制裁的政治影響主要在於制裁國與目標國之間關係的惡化。雖然制裁通常被用來試圖脅迫一個國家推行某種政治議程，但制裁最終產生的實際政治影響卻很少如此。

當一個國家成為制裁的目標時，政府往往會將其視為對其合法性的攻擊。如果領導人在制裁面前退縮並立即遵守制裁國的要求，那麼這會讓領導人看起來很軟弱，尤其是在要求與政府的核心理想有關的情況下。由於在選民眼中看起來軟弱的領導人不會取得長期的政治成功，因此至關重要的是要發出他們「勇敢面對惡霸」的形象，即使這樣做最終造成的危害大於簡單地遵守制裁國的要求。結果是「團結在國旗周圍」效應，民族主義和情感優先於經濟發展。

正如 Tadeáš Pala 2021 年的論文「經濟制裁的有效性：文獻綜述」中所討論的那樣，一個有趣的例外是，奇怪的是，當對與制裁國有牢固的歷史和當前關係的國家實施制裁時。雖然對一個通常與制裁國關係良好的國家實施制裁似乎違反直覺，但在這種情況下，制裁實際上會帶來更高的有效性，因為目標國往往更有意願遵守，以免損害長期關係。因此，奇怪的是，制裁可能是一種建立合作的形式，而不是對國家價值觀的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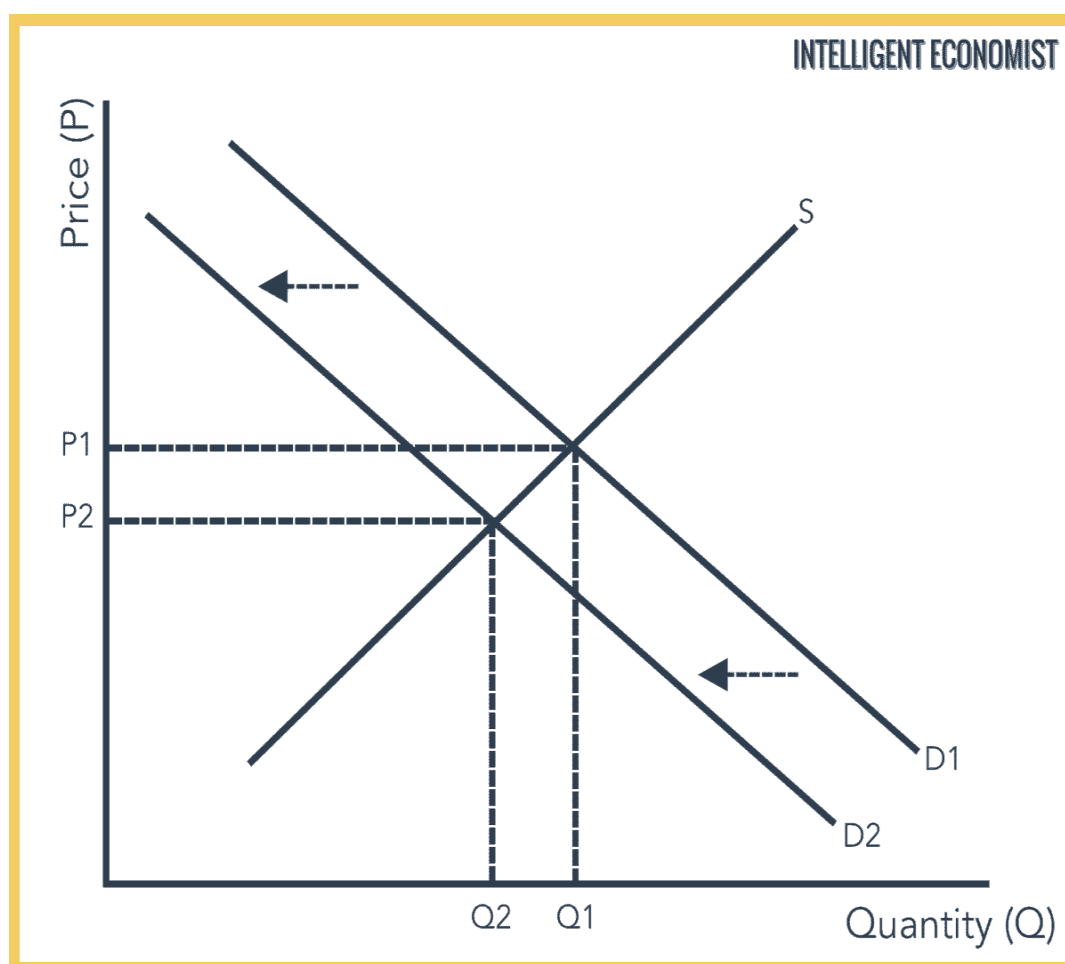
然而，這些友好國家的制裁只佔少數情況。大多數情況下，當制裁出現時，關係已經惡化。目標國通常不會遵守制裁國的要求，制裁將被視為攻擊。結果是兩國關

係惡化，民族主義抬頭，往往是雙方的民族主義，雙方都更容易在未來拒絕合作。不幸的是，制裁很少能帶來積極的局面或實現其最初設定的目標。

制裁的經濟影響

制裁最直接和明顯的影響是經濟衰退。由於制裁擾亂了國家之間的自然貿易，它們就像一把雙刃劍——不僅損害目標國，還損害制裁國，而且在許多情況下，還會損害未參與的國家。

從本質上講，制裁通過設置人為的貿易壁壘來干擾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概念。政府沒有讓市場自由運作，而是利用制裁來限制經濟活動，導致資源短缺、生產分配效率低下和經濟增長放緩。這些負面影響會影響受制裁國和制裁國。



在賣方方面，制裁消除了買家，迫使企業減少生產、解僱工人，並導致失業率上升和經濟萎縮。在買方方面，除非受制裁的商品很容易被另一家供應商以相同的價格替代，否則消費者將被迫支付更高的價格或選擇質量較低的替代品。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低效率會限制收入、減少市場供應並進一步抑制經濟增長。即使受制裁的國家不以反制裁進行報復，雙方也會遭受經濟損失。

對未參與國家的溢出效應

制裁很少局限於直接參與的國家。由於全球經濟相互關聯，一個國家的經濟衰退往往會在其他國家產生連鎖反應。受制裁國家經濟的衰退降低了其購買力，導致與未參與國家的貿易減少。反過來，這些中立國家的收入減少，這削弱了它們自身的經濟，並進一步削弱了全球購買力。這種循環加劇了更廣泛的經濟不穩定，表明制裁不僅損害了爭端各方，還會擾亂全球市場。

也就是說，在某些情況下，未參與的國家可能會從制裁中受益。當一個受制裁的國家失去進入關鍵市場的機會時，往往會導致商品供過於求，需要在其他地方銷售。這種過剩壓低了價格，使中立國家能夠以折扣價購買商品。這就是對俄羅斯的制裁導致的石油價格情況，中國和政治立場相似的國家能夠以較低的價格搶購石油。因此，在貿易爭端中保持中立有時在經濟上是具有戰略意義的。

制裁的成本

雖然制裁的經濟影響是不可否認的，但量化受制裁國和制裁國的確切損失是困難的。由於不可能準確衡量在沒有制裁的情況下會發生的實際貿易，因此估計仍然是推測性的。然而，無論如何，仍然可以進行估計並跟蹤趨勢，以估算髮生的損失。

美國商會支持的 2009 年的一項研究估計，美國對古巴的禁運每年給美國經濟造成的損失約為 12 億美元，而古巴每年損失約 7.53 億美元。按 GDP 的百分比計算，古巴的比例損失更大，但從絕對值來看，美國的損失更大。雖然這種情況是針對美國和古巴禁運的，不能推廣到所有制裁，但它突出了一個基本事實：制裁國和受制裁國都會遭受經濟損失，制裁國遭受的損失可能大於受制裁國。

雖然這種情況說明了制裁的潛在經濟影響，但它涉及一個相對較小且孤立的經濟體。當對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的主要貿易夥伴實施制裁時，經濟後果將變得極其複雜和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制裁的「雙刃劍」將造成更深層次的傷害，不僅對目標國造成重大損害，而且對制裁國和更廣泛的全球經濟造成重大損害。

當一個嚴重依賴與特定國家貿易的國家對該國實施制裁時，就會造成一系列連鎖的經濟破壞。首先，制裁國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出口市場，可能會削弱依賴該貿易的行業。尋找能夠消化損失的貿易量的替代市場可能是一個緩慢而代價高昂的過程，往往會導致長期的經濟損失。

其次，制裁國可能會面臨以前從目標國採購的必需品或零部件短缺或價格上漲的問題。如果目標國是全球供應鏈中的主要供應商，則尤其如此。這些供應鏈的中斷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影響全球多個行業和經濟體。例如，依賴受制裁國家的特定原材料、製成品或技術部件的行業可能會遇到生產瓶頸、延誤和成本增加。

第三，現代全球經濟的相互關聯意味着，對主要貿易夥伴實施制裁造成的經濟後果遠遠超出了直接參與的國家。由此產生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可能引發全球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長的下降。金融市場可能會出現波動，貨幣可能會波動，企業可能會推遲投資決策，從而進一步加劇經濟衰退。

此外，對主要經濟大國實施嚴厲制裁可能導致全球經濟分裂。各國可能被迫選擇立場，可能導致形成相互競爭的經濟集團和國際合作的下降。這種分裂可能會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體系，並給全球經濟治理帶來長期挑戰。

雖然對任何經濟體的制裁都可能產生重大影響，但受制裁國家的經濟規模和依賴受制裁國家產業的國家數量與制裁的經濟影響直接相關。自筆者造成的經濟損害、全球供應鏈中斷和更廣泛的全球經濟不穩定的可能性要求各國在考慮實施制裁時應保持警惕和戰略性。雖然在適當的情況下制裁可以是戰略性的，但由於制裁很有可能造成負面的全球經濟影響，因此各國應仔細參考條件組來確定是否實施制裁。

對制裁的現實主義視角的論證以及進一步使用制裁的理想情景

在國際關係中，不同的學派對國家衝突有不同的處理方法。本文是從現實主義 (Realism) 的角度撰寫的，這意味着國家被視為自私自利、渴望權力，並在無政府狀態的競爭體系中充當理性行為者。與自由主義 (Liberalism) 和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等競爭理論不同，現實主義不太關注國家合作。相反，現實主義者從基於衝突的範式來處理國際關係。

雖然自由主義認為國際機構、經濟相互依存和外交可以促進國家之間的合作，但現實主義者認為其有效性往往被誇大了。只有當合作符合國家利益時，合作才會發生，如果國家認為合作機制對其安全或主權構成威脅，就會放棄合作機制。另一方面，建構主義強調思想、規範和身份在塑造國際政治中的作用。雖然這些因素肯定會影響國家行為，但它們不會凌駕於生存和權力的基本現實主義原則之上。在危機時期，物質利益和戰略關切優先於規範和意識形態。看看俄羅斯侵入烏克蘭等事件證

明，國家是作為自私自利的行為者行事的，雖然自由主義制度可以幫助塑造國家行為，但它們並沒有凌駕於基本的現實主義現實之上。

這個現實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世界不理想的狀態。由於權力未能整合為一個統一的機構，現實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依然存在，並導致我們所見的戰爭、衝突和制裁。由於各國不願放棄其權力，和平便無法實現；而在這個不太可能發生的未來到來之前，持續研究國家間的衝突是必要的。

外交與制裁

現代世界的經濟制裁主要用作一種信號傳遞工具，允許各國公開譴責對其國家利益的威脅，並試圖（儘管大多失敗）脅迫目標國發生變化。為了讓各國與特定的「團隊」保持一致，它們通常被期望對目標國實施類似的制裁，這進一步加劇了經濟制裁的負面影響。制裁允許各國在不需要使用武力的情況下，展現出反對目標國行動的形象。然而，還有更好的方法來表達不滿，而不需要犧牲潛在的經濟增長。制裁最終是一把雙刃劍，損害了所有相關國家的經濟利益，並造成人為的經濟衰退。

鑒於存在外交選擇，許多爭端可以通過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解決，因此外交應始終是任何爭端中的首要行動方針。雖然自由主義理論強調外交和多邊機構的力量，但現實主義者認識到，只有當國家認為合作有利於其利益時，外交才會有效。由於全球體系仍然處於無政府狀態，沒有中央集權，戰爭和衝突仍在繼續，以生命、和諧與經濟增長為代價。雖然一個理想的世界將看到所有國家解散軍隊，轉而支持專屬外交解決方案，但這帶來了一個安全困境：即使只有一個國家打破這種模式並開始建立軍隊，其他國家也會感到被迫效仿。這種軍事擴張會產生複合效應，導致各國將大量資源投入軍隊以進行防禦。除非建立全球體系，並且所有國家都願意放棄權力以支持集

中化的全球控制，不幸的是，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否則全球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將持續存在。

制裁之所以成為一種外交政策工具，是因為它允許各國在不進行直接軍事行動的情況下削弱對手。對制裁國的負面經濟影響可能尤其明顯，特別是當對目標國大量出口到制裁國的行業實施制裁時。然而，除非制裁是在滿足本文前面列出的條件組的情況下實施的，否則將會產生長期的負面經濟影響，影響目標國、制裁國和全球經濟。實施制裁的國家往往忽視了他們因實施制裁而受到的負面影響，認為這不如給目標國造成痛苦重要。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尤其是美國的領導人，經常將制裁作為一種政治工具，對敵對國家表現出強硬態度，正如川普發起的

中美貿易戰所見。在這種情況下，制裁更多地是作為一種國內政治戰略，而不是一種有效的外交政策措施。

各個國家政治立場在制裁影響中的作用

聯盟和全球政治立場在決定制裁的有效性方面發揮着關鍵作用。在一個相互關聯的世界中，經濟制裁很少孤立地發揮作用。當一個國家制裁另一個國家時，所有其他國家都被迫做出戰略選擇，要麼與制裁保持一致，加強其影響並增加多邊性，要麼繼續與受制裁國家接觸，從而削弱制裁的有效性，但可能會創造一個使參與國受益於人為增加供應和人為減少需求的環境。

集體制裁的力量

最有效的制裁是多邊實施的制裁。當多個盟國同意制裁一個國家時，目標國將處於這樣的境地：要麼利用替代品，以通常更糟糕的條件與不太有利的替代經濟夥伴

進行貿易，要麼有時面臨行業停工，因為他們以前的生產不再具有戰略優勢。即使受制裁的國家能夠出售以前交易的商品或服務，也需要接受人為壓低的價格才能在財務上競爭，並且將遭受經濟損失。強大的聯盟可以造成嚴重的經濟壓力，使受制裁國家更難利用替代戰略來減少損失。

例如，對利比亞的制裁之所以特別有效，是因為它們是由廣泛的聯盟實施的，並且制定了聯合國決議來支持制裁制度。這種程度的多邊合作大大削弱了利比亞的經濟，使其很難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並最終導致利比亞為了緩解經濟壓力而遵守制裁國的要求。

相比之下，單邊制裁的效力要低得多。例如，美國對古巴的禁運已經持續了幾十年，對古巴經濟造成了持續的負面壓力，但尚未實現美國希望實現的任何政治目標。這主要是因為古巴是一個政治上具有決定性的國家，並且能夠與反對美國的國家發展替代貿易關係。如果沒有廣泛的國際參與，制裁往往無法實現其政治目標。

實現多邊制裁的障礙

雖然國家之間牢固的關係往往會導致許多「團隊」中的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的制裁制度保持一致，通常是通過聯合國這樣的國際機構，但國家也有強烈的經濟動機不與制裁制度保持一致。

當制裁發生時，受制裁的國家更難進行貿易，並且往往會以折扣價出售商品，例如對俄羅斯的制裁導致的結果。未參與的國家可以積極反對制裁，也可以選擇保持中立，繼續與目標國進行經濟接觸。這些行為體可以為目標國提供經濟生命線，減輕制裁的影響，並可能延長僵局。在一個日益多極化的世界中，主要大國往往具有相互

競爭的利益和複雜的關係，因此，此類國家出現的可能性很大，並且在制裁不是為了全球共同目標，而是為了一個國家的政治野心而實施的任何情況下都可能發生。

制裁政策的戰略考慮因素

鑒於盟國在決定制裁成敗方面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制裁國在制定制裁政策時必須仔細考慮以下因素：

- 建立強大的聯盟：通過多邊協議實施的制裁要有效得多。儘早接觸外交夥伴並獲得廣泛的國際支持會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未能在制裁制度的早期建立聯盟，則可能會導致另一例單邊制裁，而這種制裁很容易通過替代來解決。
- 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盟國的經濟影響：制裁將對所有相關方產生重大的財務影響。如果一個國家特別有興趣建立一個聯盟來創建多邊制裁制度，那麼該國可以向結盟國家提供財政激勵，例如對參與制裁的國家提供補貼、援助或減少與聯盟建設國的貿易壁壘。如果該國能夠說服其他國家，讓他們相信通過參與制裁聯盟可以在財政或政治上獲得空間，那麼他們就更有可能這樣做。
- 解決不合作國家造成的漏洞：制裁聯盟必須預料到敵對國家或中立國家會介入，填補制裁留下的經濟空白，並允許受制裁國家進行替代。如果一個國家有興趣不惜一切代價制裁另一個國家，那麼二級制裁等策略可以幫助遏制替代，並將受制裁國家置於更危險的境地，二級制裁是指懲罰繼續與受制裁國家開展業務的實體。然而，這對制裁方來說最終可能是非常昂貴的，會導致全球經濟嚴重衰退，並造成高度分裂的貿易體系。如果二級制裁成功，並且世界各國都

願意與制裁保持一致，以避免自己受到制裁，那麼它們可能成為一種強大的工具，導致受制裁國家完全缺乏貿易夥伴。

- 確保長期承諾：制裁通常是一項長期戰略，其有效性取決於持續的執行。如果盟國開始過早解除制裁或執行不一致，制裁將變得越來越單方面，因此實現其目標的可能性將大大降低。

現實主義視角的論證

從現實主義的框架來看，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什麼國家要實施制裁以及如何優化其使用。在一個理想的世界中，國家對制裁的使用將被限制在第 24 頁和第 27 頁上的條件組中。制裁不應被用作僅僅譴責其他國家行為的方便工具，而應保留用於可能實現某種目標，同時盡量減少對公民的負面影響的情況。

這種理想情況需要改變各國對制裁的看法和使用方式。制裁不應被用作表示反對或施加壓力的手段，而應被視為一把雙刃劍，應謹慎使用。各國在實施制裁之前需要確保制裁是相稱的、有針對性的，並伴有明確的目標。制裁應該有一個明確的預期結果，同時保持靈活性。

此外，各國在實施制裁時應優先考慮多邊合作與協調。國際社會之間的集體行動和共識可以大大提高制裁的有效性。雖然國家的無政府體系仍然存在，但仍然可以通過國際組織協調國家之間的合作，以服務於集體利益。國家能夠通過集體利益共同努力為自身服務，並且通過利用國際組織，國家將增強制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此外，各國在實施制裁時應優先考慮對國家政府影響最大，同時對公民影響最小的制裁。雖然這非常困難，因為公民與國家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在政府大

量參與和投資於某個特定行業的案例中，這當然是可能的。制裁的核心目標之一應該是做出有針對性的改變，以減輕戰爭的必要性。制裁應該保留用於傳統外交渠道無效，但有可能在不需要軍事干預的情況下實現預期結果的情況。

在擴展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對比作用時，必須考慮各國如何主要將制裁作為權力政治的延伸，而不是真正合作的嘗試。自由主義認為，經濟相互依存會抑制衝突並促進穩定，但現實主義者認為，當符合國家安全目標時，各國仍將訴諸經濟脅迫。同樣，建構主義者強調國際規範在塑造制裁政策中的作用，但現實主義思想認為，當生存和權力受到威脅時，國家將拋棄規範性關切。某些制裁未能實現合規，例如北韓儘管受到廣泛的國際制裁，但仍保持韌性，這表明了現實主義原則，即國家將權力積累置於外部壓力之上。

最終，在一個理想的世界中，制裁的使用將僅限於一小部分案例，並且除非滿足條件組，否則各國將避免訴諸制裁。鑒於制裁的破壞性，一般來說，只有在有充分的把握認為制裁會有效並能降低發生軍事戰爭的可能性時，才應實施制裁。

第二部分結論

可以看出，經濟制裁雖然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有用的，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會帶來大量負面影響，不僅影響那些積極參與的國家，還會影響與受制裁國或制裁國有任何經濟關係的所有國家，或者與制裁國或受制裁國有聯繫的其他國家。制裁的影響可能包括貿易和投資減少、通貨膨脹加劇和經濟不穩定，以及獲得食品和藥品等重要資源的機會減少。此外，制裁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包括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對制裁國造成廣泛的經濟損害或加劇人道主義危機。然而，根據條件組正確使用的制裁可以成為迫使一個國家發生變化的一種手段。鑒於本節上述所有這些風險，各國在使

用制裁之前必須仔細考慮使用制裁的潛在成本和收益，並準備隨着情況的變化調整其戰略。

第三部分：展望未來

正如我們在古巴等情況中看到的那樣，對一個國家實施制裁可能持續多年，導致制裁國和受制裁國持續遭受經濟損失，造成人道主義危機，無法實現其目標，並且看不到盡頭。一個重要的、可能即將到來的涉及制裁的衝突領域是對台灣的入侵。鑒於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融合以及台灣的戰略重要性，中國大陸侵入台灣是對制裁有效性的一個關鍵測試案例。在撰寫本文時，兩岸關係一直在惡化，一些分析人士預測未來幾年內會發生戰爭。通過加強對台灣民進黨領導層的批評，以及台灣附近各種軍事演習的故事，台灣統一已成為中國新聞的前沿。中國大陸不斷挑起緊張局勢，並盡其所能地在外交上孤立台灣。由於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是許多國家的重要的貿易夥伴，人們非常擔心對中國實施嚴厲制裁可能意味着什麼。當前的中美貿易戰已經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重大的負面影響，而這僅僅是對相對較小的一組商品的制裁。在本節中，筆者將首先總體分析制裁的成本，並對恃強凌弱的國家這一主題進行一般性討論。然後，筆者將專門討論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局勢，分析西方在對中國大陸實施制裁方面可以採取的各種方法，並利用第一部分結論中列出的條件組來提出筆者對最佳戰略的看法。

干預的成本

國家干預外國衝突會給干預國和目標國帶來巨大的成本，不可避免地會在整個全球經濟中產生反響。強大的國家可以利用其軍事力量來剝削甚至征服較弱的國家。然而，關於其他強國是否應該對抗這些「恃強凌弱的國家」以保護較弱的國家，仍然存在爭議。雖然對某些人來說，這在道德上似乎是錯誤的，但在許多情況下，不干預

衝突有時會在長期內帶來對全球範圍內最好的結果。干預有能力提升一個國家的形象，傳播特定的意識形態，加速衝突的結束，並以更接近干預國願望的方式塑造世界。然而，無論干預是純粹基於制裁還是涉及軍隊，干預的成本都可能是巨大的。

不言而喻，軍事戰爭具有極其巨大的社會和經濟後果。當國家選擇參與軍事衝突時，他們承諾犧牲其公民的生命，並願意承擔使用軍隊的巨額成本。戰爭的經濟成本是巨大的，包括武器、後勤和重建方面的支出，以及貿易、投資和基礎設施中斷等長期影響。戰爭造成代際創傷，極大地擾亂社會結構，同時也給經濟帶來壓力。

另一方面，經濟制裁雖然不像軍事行動那樣致命，但也可能對目標人群、制裁國的人群造成相當大的傷害，併產生影響整個全球經濟的經濟溢出效應。制裁可能擾亂貿易關係，阻礙獲得基本商品和服務，並破壞普通公民的生計。此外，當制裁不符合第一部分結論中列出的條件時，其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鑒於軍事干預的巨額成本以及在大多數情況下制裁的無效性，各國面臨著一個兩難境地：「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來遏制侵略性國家？」以及「是否真的應該採取措施來遏制侵略性國家？」筆者將在以下章節中探討這些問題。

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來遏制侵略性國家？

在處理侵略性國家的問題時，至關重要的是要評估侵略性國家與目標國之間關係的性質。在兩個國家之間存在高度相互依存關係的情況下，對該國採取任何形式的行動都可能切斷關係，並導致不必要的嚴重經濟和/或社會動蕩。非附屬國可能難以處理衝突，因為為了提升其形象，它們必須避免被視為支持不必要的暴力和苦難，但與此同時，也必須避免被視為縱容違背其意識形態議程的政權，所有這一切的同時，理想情況下要盡量維持儘可能多的積極互利關係。通常情況下，許多成功的、但規模較

小、全球相關性較低的國家（如新加坡和瑞士）在這些情況下所做的，無論衝突如何，都是拒絕選邊站隊，並在衝突雙方繼續尋求經濟合作。因此，這些國家往往在財政上表現良好，並受益於衝突和相關制裁造成的人為供應增加和需求減少。然而，由於這種行為，這些國家往往對全球衝突的結果幾乎沒有控制權，只能適應外國衝突帶來的變化。雖然這總體上是一個很好的戰略，因為它最大限度地促進了經濟合作，並使國家遠離戰爭的經濟和人道主義風險，但中立對更強大的國家來說可能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後果。

對於更強大的國家來說，在全球衝突中保持中立的前景提出了一個多方面的問題。雖然不直接參與似乎在戰術上是謹慎的，並且有利於維護國家的資源和維持積極的關係，但保持中立的國家也將被迫接受外國衝突的任何結果，並且可能放棄將外國衝突更快地結束的機會，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經濟影響和生命損失。在 Tskasa Watanabe 2022 年的論文「事前預期的影響 (The Effect of Ex Ante Expectations)」中，Watanabe 得出結論，軍事干預可以加速或減緩衝突，這取決於對手自身的軍事能力。在強大的外國勢力支持衝突中較強一方的情況下，儘管這種情況的發生很罕見，較弱的一方將很快被擊敗，更有可能同意和平解決方案。如果強大的外國勢力支持衝突中較弱的一方，衝突將會延長。Watanabe 在他的論文中還得出結論，衝突的持續時間（不包括停火時間）與死亡人數和經濟成本有很強的相關性。因此，從 Watanabe 的論文中可以得出結論，如果干預的目標不是基於意識形態，而是基於希望盡量減少痛苦和經濟損失的原則，那麼在沒有所有其他因素（例如衝突一方採取倒退政策）的情況下，干預在幫助衝突中軍事實力較強的一方時最有利，而在幫助較弱的一方時則具有破壞性。

不幸的是，這留下了像俄羅斯這樣的「恃強凌弱的國家」的難題。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西方正在援助烏克蘭，即衝突中較弱的一方，從而不幸地延長了衝突，並可能造成更多的傷亡，削弱全球經濟。在一個假設的情境中，如果西方轉而支持俄羅斯對抗烏克蘭，衝突很可能會迅速消散，和平將會恢復，局勢也會穩定下來。然而，除了這很可能不符合西方的利益之外，各國也不太可能援助那些在衝突中被視為明顯優勢強權的國家。

是否真的應該採取措施來遏制侵略性國家？

本文描述了制裁最有可能有效的情況，同時也討論了與支持衝突中較弱派別的軍事干預相關的經濟和人道主義危機可能加劇的問題。雖然可以方便地說，各國應該有一種明確的良好方式來處理衝突干預，無論是經濟干預還是軍事干預，但不幸的是，沒有簡單的答案，各國需要考慮他們選擇採取的任何途徑的後果。由於經濟制裁的破壞性，它是一把雙刃劍，而且必須滿足某些條件才能使其對衝突產生積極影響，因此各國應將其使用限制在條件組規定的情況範圍內，而不是僅僅將其作為譴責目標國行為的一種手段。在筆者看來，各國應該利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來表達他們對恃強凌弱國家的行為的不滿，並且通常避免讓經濟參與其中，除非滿足制裁的條件組。國家仍然有能力通過軟實力來影響和施壓其他國家，而不會造成任何嚴重後果，而且無論情況如何，軟實力始終是對抗恃強凌弱國家的最佳第一道防線。然而，當軟實力不足以阻止恃強凌弱的國家採取行動時，各國必須權衡干預衝突是否值得。

正如 Watanabe 的論文所述，強大的國家代表衝突中的強國進行干預往往會導致衝突加速結束，並最大限度地減少衝突的人道主義和經濟成本。這意味着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軍事干預實際上是一件非常積極的事情，除了加快時間框架外，還可以促進衝

突中較強國家與進行干預的強國之間的關係。唯一的缺點是，進行干預的強國需要投入資源，願意讓其士兵參與外國衝突，並且必須確保他們所支持的一方將是他們希望與之結盟的國家。

在恃強凌弱的國家攻擊較小國家的案例中，強大的國家必須考慮代表受欺負的國家進行干預所造成的破壞是否真的值得付出代價。有時，什麼也不做，讓「惡霸」獲勝將是最理想的結果。沒有干預，生命將得到拯救，經濟將更加穩定，衝突將更快結束。然而，這將不可避免地以犧牲被攻擊國家的自主權為代價，使恃強凌弱的國家有機會擴大其在受攻擊地區的影響力。最終，每個案例都是不同的，應根據具體情況來確定干預是否合理。在筆者看來，只有在以下情況下才應該進行代表較弱國家的軍事干預：

- 外交談判和施壓失敗。
- 成功的經濟制裁的條件組沒有得到滿足。
- 不干預將意味着權力平衡將發生重大變化，有利於敵對國家。

最終，與經濟制裁一樣，軍事干預不應掉以輕心，選擇進行軍事干預以支持較弱國家的國家應該有非常充分的理由這樣做。

中國的局勢性質

首先，西方目前無法通過制裁徹底摧毀中國經濟。雖然在中國的爆炸性經濟發展之前，制裁可能有可能產生重大影響，但中國目前的狀態與那個時期相去甚遠。現在，許多國家在選擇與西方或中國保持經濟關係時，都會選擇中國。即使西方對中國

實施「抵制」，並且對任何與中國合作的國家實施二級制裁，這也不太可能對許多國家構成脅迫。到目前為止，有 128 個國家與中國的貿易額超過了與美國的貿易額 (Roland, Leng, 2019)。中國的經濟實力太強大了，無法像美國對伊朗那樣使用抵制策略。在考慮入侵台灣的情況下使用什麼戰略時，必須理解這一點。

雖然全面禁運和抵制中國不會阻止中國經濟有效運轉，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不害怕這種針對中國的經濟政策的影響。中國領導人多年來不知疲倦地努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的經濟成功主要與其與世界其他國家進行貿易的能力有關。雖然中國共產黨在過去犯下了許多可怕的罪行，但由於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人民的生活質量不斷提高，他們仍然贏得了其選民的高度支持。雖然中國在入侵台灣的情況下肯定能夠增強大陸的民族主義，並保持人民的支持，尤其是在入侵以「成功」告終的情況下，但如果因圍繞戰爭的經濟制裁而導致經濟衰退，那麼中國可能會出現一些異議，這一點不容忽視。正如中國在「白紙革命」開始蔓延後迅速扭轉清零政策所證明的那樣，中國領導層非常害怕抗議和認為中國不完美的想法。制裁造成的經濟衰退有可能引發這樣的運動，並使人們認為西方應該考慮在台灣發生戰爭時對中國實施嚴厲的經濟制裁。

基於中美貿易戰的經濟損失預測

要了解美國對中國實施禁運對全球經濟意味着什麼，一個很好的估算其潛在影響的方法是看看中美貿易戰的影響。在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間，僅美國出口的損失估計就達 300 億美元 (Roberts, 2019)。雖然在此期間制裁的嚴重程度確實有所波動，但由於這些數字僅用於預測如果實施禁運可能造成的損失，並且由於將有太多變量需要考慮，因此不可能得到完全準確的數字，因此使用平均損失而不考慮這些波

動仍然是可以接受的。根據這些數字，美國出口損失相當於平均每月約 13.6 億美元，或每年 163.6 億美元。總體而言，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從 2017 年的 4590 億美元下降到 2019 年的 4300 億美元。截至 2021 年，在 46% 的關稅得到緩解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長到 5300 億美元。2022 年，美國對所有國家的出口總額為 25566 億美元，這意味着在中國的所有美國出口中，中國占 20% 以上。即使在貿易戰進行期間，美國仍有 20% 的貿易額來自中國 (Census.gov, 2023)。

雖然很難估計對美國經濟的總成本是多少，但如果對中國實施禁運，考慮到美國與中國的貿易總額佔多大比例，毫無疑問，禁運將導致美國和全球經濟大幅下降。如果其他西方國家「與台灣站在一起」，也對中國大陸發布類似的經濟禁運，那麼對全球經濟的成本將更大。

正如中美貿易戰中美國經濟的總損失更大所證明的那樣，如果對中國實施禁運，美國需要準備承受比中國更大的經濟損失。雖然中國對貿易戰的報復性關稅較低，但由於貿易戰，美國遭受的經濟總損失更大。沒有理由認為禁運會有任何不同。由於美國的禁運，中國經濟將會萎縮，但美國經濟將會下滑得更多。

雖然無法確定如果西方對中國實施禁運，全球經濟將面臨的嚴重影響，但其影響將在世界各地感受到，一場嚴重的全球市場崩潰和衰退註定會發生。

如果大陸侵入台灣，對中國實施較輕制裁的影響

如果入侵，對中國實施輕微制裁是完全無用的、代價高昂的，除了向中國發出美國不贊成這種入侵的信息之外，不會帶來任何好處，而中國已經非常清楚這一點。輕微的制裁只會造成雙方的經濟損失，但對中國重新考慮入侵幾乎沒有作用。由於統

一中國是中國的首要任務，因此只會對經濟造成輕微影響的輕微制裁根本不會起到阻止入侵的作用。如果有任何經濟制裁政策沒有意義，那這就是。

從俄羅斯制裁中吸取的教訓

俄羅斯的制裁形勢是最近發生的，與台灣的地緣政治形勢最為相似。自入侵烏克蘭以來，俄羅斯因其軍事行動而面臨嚴重但並非全面的制裁。因此，俄羅斯經濟遭受了損失，戰爭造成了重大損失，而且烏克蘭大部分地區尚未被征服。由於這種情況與台灣自身的情況有很多重疊，中國一直在密切關注烏克蘭局勢的發展。

很明顯，對俄羅斯的制裁已經給西方和俄羅斯帶來了嚴重的經濟代價，但總體而言，它們未能阻止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由於俄羅斯仍然能夠維持足夠的經濟活動，該國有發動戰爭的意願，以及俄羅斯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力，因此制裁雖然可能至少對整體軍事能力有一些影響，但未能脅迫俄羅斯。如果在中國大陸侵入台灣時對中國實施制裁，情況可能也是如此。

雖然這兩種情況並不完全相同，但俄羅斯和中國都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在西方實施經濟制裁的情況下，擁有將繼續與它們進行貿易的盟友，擁有龐大的經濟體，渴望征服附近的土地，並且與西方世界的政治關係較弱。因此，如果對中國實施與對俄羅斯類似的制裁，則應該預料到類似的結果。

使用條件組分析情況

為了在成功的情況與中國大陸侵入台灣後可能對中國實施制裁的情況之間進行比較，最好是看看過去的成功情況，並確定中國的情況是否與它們具有共同的因素。

有關共同因素，請參閱第 27 頁上的條件組 #2。情況越偏離這些特徵，制裁就越有可能以失敗告終。

如果中國大陸侵入台灣，強大的國家集團可能會強烈譴責。然而，雖然中國大陸可能不會得到任何主要國家的強而有力的支持，但許多國家可能會在這一問題上保持中立，並公開將其視為他們不參與的「國內問題」，從而保護他們與中國大陸保持貿易的權利。與佩普使用的南非種族隔離的例子不同，世界不像反對種族主義的種族隔離政府那樣團結一致地反對中國大陸。

此類制裁的核心目標是脅迫中國大陸撤出台灣。假設各國不使問題複雜化，並且不將他們與中國大陸的其他不滿添加到與制裁相關的談判中，那麼如果要使用此類制裁，這將是一個明顯的優勢領域。

如前所述，經濟影響力很弱，可能是導致通過制裁進行政治脅迫失敗的最重要因素。由於制裁尚未實施，因此無法判斷其潛在的靈活性。

雖然在因侵入台灣而實施制裁的情況下，目標將是明確的，但主要問題是，無論反對國做什麼，它們都沒有經濟或政治影響力來通過制裁單獨迫使中國大陸屈服。這使得中國與佩普的所有成功案例都不同，並且由於中國部分地區的經濟發展與西方國家相似，因此實施成功的制裁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對於下一節，請參閱第 24 頁上的條件組 #1。根據筆者的定義，只需滿足其中一個條件即可證明經濟制裁的合理性。

- 中國雖然人均 GDP 屬於中等收入國家，但仍然擁有世界上最大的 GDP。中國不符合這個條件。

- 鑒於中國經濟的規模，制裁不可能使其癱瘓，尤其是在許多國家更喜歡與中國進行貿易而不是與美國進行貿易的情況下。
- 中國雖然重視與美國的經濟關係，但不能歸類為依賴美國。替代雖然不理想，但很容易實現。
-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中國的核心理念。制裁將無法導致這一政策的改變。

因此，筆者提出的所有條件都沒有得到滿足，這使得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國實施政治制裁很可能是不合理的。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國實施制裁的主要問題是：

- 中國經濟的規模及其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夥伴關係將使制裁在改變政治現實方面幾乎毫無用處。雖然如前所述，經濟衰退會損害一個國家的合法性，但這不太可能與因與台灣發生戰爭而產生的民族主義熱情相抗衡。
- 中國將台灣問題視為國家的頭等大事。中國自成立以來一直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將台灣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存在視為最緊迫的問題之一。如果發動入侵，中國大陸不太可能僅通過經濟手段就被迫退卻。

因此，鑒於制裁不僅給相關國家而且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代價，而且在中國大陸侵入台灣的情況下，對中國大陸實施制裁在政治或軍事上取得任何成功的可能性非常有限，因此各國最好在此類入侵期間與中國大陸保持正常的經濟關係。雖然這種觀點可能存在爭議，尤其是對那些重視保衛台灣的人來說，但鑒於證據，這是最好的政

策，它既維持了全球經濟，又不會給所有相關方造成無益的經濟破壞，而不會帶來任何好處。

潛在的應對措施

儘管制裁很可能無法脅迫中國大陸，但在中國大陸侵入台灣的情況下，美國極有可能對中國大陸實施經濟制裁。這與美國過去在任何「恃強凌弱的國家」宣戰併入侵另一個國家的情況下採取的行動是一致的。這可以從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俄羅斯侵入烏克蘭和格魯吉亞中看出。從本質上講，在過去的 30 多年中，每當一個更大更強大的國家侵入一個較弱的國家時，美國都會對入侵國實施制裁。沒有理由相信，在當前的氣候下，尤其是考慮到當前這位熱愛關稅的美國總統，在中國大陸侵入台灣的情況下，結果會有任何不同。

美國與台灣有着長期而獨特的關係。雖然一個中國原則要求美國不與台灣建立正式關係，但兩國之間仍然存在非常牢固的非正式關係。美國在台北設有外交使團，是台灣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並且保護台灣作為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外交結盟國家。

美國在 19 世紀奉行在整個太平洋擴張的政策。這最初是為了促進與中國的貿易，並使美國更容易進入中國市場。美國吞併了關島、北馬里亞納群島、夏威夷以及其他太平洋島嶼等領土。雖然這最初純粹是基於貿易，但美國對太平洋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證明對美國軍隊很有用，並允許美國在遙遠的太平洋地區施加影響力。當中國「淪陷」於共產主義時，美國在太平洋的存在對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擴張以及對台灣的攻擊施加了壓力。

台灣本身是遏制中國在該地區影響力的主要緩衝區。由於台灣與西方結盟，實現了民主化，並且越來越反華，因此台灣幾乎可以像一個現代西方殖民地一樣運作。

正如本論文通篇所述，在中國大陸侵入台灣後對中國大陸實施經濟制裁，雖然是可以預見的，並且就美國目前的情況而言，這是一種極有可能的應對措施，但在實現迫使中國大陸撤出台灣或促進中國大陸內部發生任何形式的政治變革的目標方面，基本上是無效的。在這種情況下，成功實施制裁的條件組根本不存在。中國的經濟規模、其與全球的融合以及其對與台灣統一的堅定承諾使其對經濟脅迫具有很大的抵抗力。這使得美國乃至更廣泛的國際社會面臨著嚴峻而艱難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現成的、歷史上一直青睞的經濟制裁工具，並不能發揮作用。

潛在的應對措施 1：制裁中國

正如本論文通篇所述，經濟制裁，尤其是針對像中國這樣的大型經濟一體化國家，極不可能實現迫使中國大陸撤出台灣的預期結果。這並不是說不會感受到任何經濟影響；中國經濟將遭受損失。然而，正如俄羅斯等案例所表明的那樣，關鍵的一點是，僅憑經濟上的痛苦，即使規模很大，也不會轉化為一個強大而堅定的國家改變其核心戰略目標。中國的經濟規模、其與許多國家的廣泛貿易關係（這些國家優先考慮與中國的貿易，而不是與美國的貿易）以及其利用經濟替代的能力使其對單獨通過制裁進行的脅迫具有很大的抵抗力。此外，對中國實施制裁將對美國和全球經濟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害，成為一把「雙刃劍」。由此造成的全球供應鏈、貿易流動和金融市場的中斷可能引發全球經濟衰退。實施制裁的條件組沒有得到滿足。這種選擇雖然在其作為一種簡單而明確的譴責工具的能力方面可能具有政治吸引力，但最終代表了一種高成本、低回報的戰略。從本質上講，這是美國迅速造成一些損害並譴責中國行為的一種方式，但這種方式確實會給雙方造成重大損害，而無法實現任何真正的政治目

標。因此，雖然這是一種相對可能的應對措施，但它是應對這種情況的一種相當糟糕的應對措施。

潛在的應對措施 2：向台灣提供軍事援助，但不進行干預

向台灣提供美國已經在提供的武器和培訓，可以加強台灣的防禦能力，並增加中國大陸入侵的成本。這符合威懾原則，增加了中國的戰爭成本。然而，正如烏克蘭的案例所示，僅靠軍事援助不太可能足以阻止一個擁有壓倒性軍事優勢的堅定侵略者。台灣的面積小、人口有限，以及參與與中國大陸全面戰爭的意願值得懷疑，這些都使其極易受到中國大陸持續軍事行動的攻擊。這種戰略可能實現的只是延長台灣作為獨立國家存在的時間。雖然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 Watanabe 的論文證明，國家在戰爭中花費的時間越多，經濟和人道主義後果就越嚴重。因此，雖然在不進行干預的情況下提供軍事援助是一種相對可能的應對措施，因為這是美國在俄羅斯入侵後在烏克蘭一直在做的事情，但這種應對措施不太可能完全遏制中國大陸，並且很可能只會延長戰爭的時間，而不會改變台灣的命運。

潛在的應對措施 3：代表台灣進行軍事干預

這種應對措施很有可能為美國帶來積極的結果，但也是迄今為止成本最高的應對措施之一。雖然這種應對措施最有可能實現美國在台灣的目標並確保該國持續獨立，但它也將直接使美國軍隊捲入外國衝突，並造成巨大的人道主義和經濟代價。在這種情況下，將會發生兩個極其強大且擁有核武器的軍隊之間的直接正面交鋒，以決定台灣的命運。雖然美軍比中國軍隊強大得多，資金更充足，訓練也更好，但中國大陸可能會更加堅定，因為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意義遠大於對美國的意義。因此，可能導

致的結果是另一場類似越南戰爭的局面，只是這一次，美國面對的不是農民，而是世界第二強大的軍隊。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將幫助衝突中較弱的一方，因此，正如 Watanabe 的論文所支持的那樣，衝突可能會比沒有外國干預的情況下持續更長時間，並對全球經濟和台灣人民造成更具破壞性的後果。此外，如果美國進行干預，那將是一個非常堅定的中國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發生直接衝突的情況。人道主義損失絕對是巨大的，這並非史無前例，因為中國大陸絕不會輕易放棄。在現代中國政治中，天命仍然發揮着關鍵作用。如果中國大陸侵入台灣並失敗，中國共產黨將顏面掃地，並被許多中國人視為不再適合統治。因此，如果中國大陸侵入，中國大陸將盡其所能確保結果是統一。選擇這種方案最有可能維持台灣的獨立，但代價可能高得離譜。

潛在的應對措施 4：什麼都不做

這是一種極具爭議的應對措施，但以這種方式應對顯然有明顯的好處。如果美國什麼也不做，生命將得到拯救，經濟影響將是有限的，而且中國大陸與西方的關係可能會大幅改善。這種應對措施完全避免了兩個大國之間發生災難性戰爭，並允許中國大陸與西方之間的貿易繼續不受干擾地進行。

然而，這種應對措施的明顯問題是，它嚴重違背了美國當前的軍事戰略利益。雖然放棄台灣在經濟和外交方面有很大的好處，但美國也失去了一個關鍵盟友及其太平洋擴張的一部分。此外，中國大陸控制台灣可能會導致更具侵略性的行動，並鼓勵中國大陸在其他有爭議的地區進一步維護其主張。

這實質上是讓「恃強凌弱的國家」為了和平與經濟繁榮的利益而為所欲為。從純粹的現實主義角度來看，優先考慮避免重大戰爭和維護全球經濟穩定，這種選擇儘管令人不快，但從長遠來看可能是損害最小的。

第三部分結論

台灣可能遭到入侵給美國帶來了一個極其嚴重的兩難境地。正如本論文所證明的那樣，通常青睞的經濟制裁應對措施顯然不適合應對這一特殊挑戰。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全球一體化使其幾乎不受任何形式的經濟脅迫的影響。這使得美國面臨著兩種都有嚴重缺陷的道路之間的嚴峻選擇：接受台灣在政治上成為中國一部分的地緣政治現實發生改變，或者與中國大陸進行直接軍事對抗，這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是否參與戰爭的決定絕不是一個可以輕易做出的決定。然而，顯而易見的是，經濟制裁無法解決這種情況，而且在中國大陸入侵的情況下制裁中國大陸既徒勞無功，又代價高昂。在這種情況下依賴制裁併不代表務實的應對措施，而是未能掌握挑戰的真正性質以及面對堅定的地緣政治野心時經濟實力的局限性。

如果西方選擇保護台灣，那麼經濟脅迫將是一種基本上無效的方法來對付中國大陸。雖然向台灣提供軍事援助可能有助於延長中國大陸完全征服台灣所需的時間，但美國阻止中國大陸成功的唯一真正方法是派遣軍隊並直接參與衝突。在此期間，即使美國選擇與中國大陸進行積極的戰鬥，美國也應盡量維持所有不會給中國大陸帶來任何軍事優勢的積極貿易關係。雖然積極的戰鬥將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的經濟影響，但切斷貿易關係將極大地加劇這些影響。

總之，美國越參與台灣的入侵，中國大陸、美國和整個世界的代價就越大。如果美國選擇任何制裁方法，那麼他們將面臨嚴重的經濟損失，由於美國和中國經濟的規模，這將對整個全球經濟造成毀滅性的影響，同時不會產生任何重大的軍事或政治影響，也不會改變台灣的命運。如果美國選擇派遣軍事援助而不是軍事人員，那麼從長遠來看，他們只會浪費金錢，不必要地延長衝突，因為台灣將無法獨立保衛自己。

如果美國選擇派遣軍隊，那麼阻止中國大陸接管台灣的機會最大，但是，這種選擇也非常昂貴，因為這意味着世界上最強大的兩支軍隊將進行正面交鋒。由於無法量化維持台灣獨立對美國的重要性，因此沒有一種正確的選擇來處理這個問題。然而，考慮到台灣相對較小的規模和美國在太平洋已經存在的強大力量，證明保衛台灣將帶來的巨大代價似乎確實很困難。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兩個大國之間發生衝突的巨大代價，美國可能最好是在國際機構中強烈譴責中國的行為，並努力在外交上孤立中國，而不是在經濟上孤立中國。最終，美國將不得不做出選擇，保衛台灣是否真的值得。

總結

縱觀各種經濟制裁案例，雖然在某些情況下會取得成功，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它們都無法實現其最初設定的目標。雖然確定制裁的「成功」構成什麼在學術界沒有達成廣泛共識，但即使是最堅定的反制裁倡導者也會承認，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制裁可能是有用的。因此，雖然筆者在本文中提供了大量制裁失敗的案例，但當條件合適時，例如當制裁可以幫助實現明確定義的目標並獲得多邊支持時，各國使用經濟制裁是有意義的。然而，當在不滿足條件的情況下使用制裁時，其結果是影響整個全球經濟的經濟損失。因此，在情況不需要制裁時實施制裁只會削弱關係，並限制受制裁國和制裁國的繁榮。

看看中國大陸侵入台灣的案例，這是我們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面臨的現實，由於這種情況將無法滿足過去成功案例的許多共同條件，因此，如果沒有足夠的相反證據，就愚蠢地認為對中國大陸實施制裁會在任何方面脅迫中國大陸。由於軍事干預是唯一有可能阻止中國大陸接管台灣的選擇，因此美國將面臨是否保衛台灣值得付出代價的決定。

參考文獻

AFP. “China Starts Evacuating Citizens from Ukraine.” *The Moscow Times*, 1 Mar. 2022,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2/03/01/china-starts-evacuating-citizens-from-ukraine-a76683>.

Agarwal, Prateek. “Supply and Demand.” *Intelligent Economist*, Prateek Agarwal, 18 Sept. 2018, <https://www.intelligenteconomist.com/supply-and-demand/>.

Algiers Accords. 19 Jan. 1988.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China.” *Usc.edu*, 3 Mar. 2022, <https://china.usc.edu/american-perceptions-china>.

“Annual 2022 Press Highlights.” *Census.gov*, 7 Feb. 2023,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tistics/highlights/AnnualPressHighlights.pdf>.

Bain, Mervyn J. “Cuba–Soviet Relations in the Gorbachev Era.”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37, no. 4, 2005, pp. 769–791, doi:10.1017/s0022216x05009867.

Campos, Carlos Olivia, and Gary Prevost. “Cuba’s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Social Research*, vol. 84, no. 2, 2017, pp. 487–506.

“Cuba GDP 1970-2023.” *Macrotrends.net*, <https://www.macrotrends.net/countries/CUB/cuba/gdp-gross-domestic-product>. Accessed 7 May 2023.

Finlay, M. (2022, September 19). *How UTA Flight 772 became Niger's deadliest air disaster*. Simple Flying. <https://simpleflying.com/uta-flight-772-niger-air-disaster/>

Garfield, R., and S. Santana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US Embargo on Health in Cuba.”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 87, no. 1, 1997, pp. 15–20, doi:10.2105/ajph.87.1.15.

“GDP (Current US\$) - China.” *World Bank Open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CN>. Accessed 7 May 2023.

GDP growth (annual %) - Cuba. (2023). World Bank Open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CU>

“GDP per Capita (Current US\$) - Latin America & Caribbean.” *World Bank Open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end=1988&locations=ZJ&start=1987>. Accessed 7 May 2023.

關於阿拉伯利比亞民衆國的項目(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七三一號決議)(S/24846). (1992, December 20). Digitallibrary.un.org.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35677?ln=en&v=pdf>

Hodge, Nathan, et al. “Russia Launches Military Attack on Ukraine with Reports of Explosions and Troops Crossing Border.” *CNN*, Feb. 2022, <https://www.cnn.com/2022/02/23/europe/russia-ukraine-putin-military-operation-donbas-intl-hnk/index.html>.

“Iran’s Stock of Enriched Uranium Exceeds Nuclear Deal’s Limit, IAEA Says.” *Reuters*, Reuters, 1 July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ran-nuclear-limit-idUSKCN1TW2TG>.

據特設政治委員會報告書通過之決議案（聯合國大會第一七六一號決議）。
(1962, November 6). Digitallibrary.un.org.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204274?ln=en&v=pdf>

Knight, R. (2001, April). *Sanctions, disinvestment, and U.S. corporations in South Africa*. Homestead.com. <https://richardknight.homestead.com/files/uscorporations.htm>

Landler, Mark. “Trump Abandons Iran Nuclear Deal He Long Scorned.” *The New York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8 May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5/08/world/middleeast/trump-iran-nuclear-deal.html>.

Lash, Herbert, and Dhara Ranasinghe. “Stocks Fall, Ruble Dives as Russia Sanctions Hit World Markets.” *Reuters*, Reuters, 28 Feb. 2022,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europe/global-markets-wrapup-2-2022-02-28/>.

Lee, Julian. “Russia Loses 90% of Its Key European Oil Market Before Sanctions.” *Bloomberg.com*, 21 Nov.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11-21/russia-loses-90-of-its-key-european-market-before-sanctions>.

Levs, Josh. “A Summary of Sanctions against Iran.” *CNN*, Jan. 2012,
<https://www.cnn.com/2012/01/23/world/meast/iran-sanctions-facts/index.html>.

Levy, P. I. (1999). Sanctions on South Africa: What Did They Do?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2), 415–420. <http://www.jstor.org/stable/117146>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八八三號決議. (1993, November 11). Digitallibrary.un.org.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97374?ln=zh_CN&v=pdf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七四八號決議. (1992, March 31). Digitallibrary.un.org.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96976?ln=en&v=pdf#files>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一八三號決議, [S/5481]. (1963, August 7). Docs.un.org.

[https://docs.un.org/zh/S/RES/181\(1963\)](https://docs.un.org/zh/S/RES/181(1963))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一五零六號決議. (2003, August 20). Docs.un.org.

[https://docs.un.org/zh/S/RES/1506\(2003\)](https://docs.un.org/zh/S/RES/1506(2003))

聯合國大會第一七六一號決議. (1962, November 6). Wikisource.org; Wikimedia Foundation, Inc.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United_Nations_General_Assembly_Resolution_1761,_6_November_1962

Milani, Abbas The Shah, London: Macmillan, 2011, pp. 420–421.

Miller, Monica. “US-China Trade Hits Record High despite Rising Tensions.” *BBC*, BBC News, 8 Feb. 2023,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64563855>.

Ni, Vincent. “China Signals Willingness to Mediate in Ukraine-Russia War.” *The Guardian*, The Guardian, 1 Mar.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mar/01/china-mediate-ukraine-russia-war>.

Pala, Tadeáš. “The Effectiveness of Economic Sanctions: A Literature Review.” *NISPAce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vol. 14, no. 1, 2021, pp. 239–259, doi:10.2478/nispa-2021-0009.

Pan Am 103 Bombing. (n.d.). Fbi.gov. Retrieved March 5, 2025, from <https://www.fbi.gov/history/famous-cases/pan-am-103-bombing>

Pape, Robert A. “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2, 1997, pp. 90–136, doi:10.1162/isec.22.2.90.

Pepper, Margot. “The Costs of the Embargo.” *Dollarsandsense.org*, 2009, <https://www.dollarsandsense.org/archives/2009/0309pepper.html>.

Roberts, Ken. “U.S. Export Losses to China at \$30 Billion, as Temporary Trade War Truce Announced.” *Forbes*, 16 Dec. 2019, <https://www.forbes.com/sites/kenroberts/2019/12/16/us-export-losses-to-china-at-30-billion-as-temporary-trade-war-truce-announced/?sh=10f0bf911125>.

Roland, Rajah, and Alyssa Leng. “Chart of the Week: Global Trade through a US-China Lens.” *Lowyinstitute.org*, 18 Dec. 2019,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chart-week-global-trade-through-us-china-lens>.

“Sanctions Programs and Country Information.”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https://ofac.treasury.gov/sanctions-programs-and-country-information>. Accessed 7 May 2023.

- Slevin, P. (2003, August 15). *Libya Takes Blame for Lockerbie Bombing*. Washingtonpost.c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3/08/16/libya-takes-blame-for-lockerbie-bombing/bc1650eb-0178-4b2f-8f52-36cda619fb8e/>
- “Summary of the U.S. Embargo Against Cuba.” *McGrath North*, 1 Sept. 2007, <https://www.mcgrathnorth.com/publications/summary-of-the-u-s-embargo-against-cuba>.
- Swanson, Ana. “White House Unveils Tariffs on 1,300 Chinese Products.” *The New York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3 Apr.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4/03/us/politics/white-house-chinese-imports-tariffs.html>.
- Taheri, Amir. “America Can’t Do a Damn Thing.” *New York Post*, 2004.
- United States Sanctions Index*. (n.d.). Trademo. Retrieved March 2, 2025, from <https://www.trademo.com/sanctions-screener/sanctions-indices/us-sanctions-index>
- Watanabe, T. (2022). Do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s Prolong Civil Conflicts? The Effect of Ex Ante Expectations. *Armed Forces & Society*, 48(2), 302-322. <https://doi.org/10.1177/0095327X20967658>
- “What to Know about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2 Sept. 2017,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north-korea-sanctions-un-nuclear-weapons>.
- Wonju, Y. (2020, January 9). *N. Korea ranks No.1 in military spending as percentage of GDP*. Yonhap News Agency. <https://en.yna.co.kr/view/AEN20200109007500325>